

南華大學出版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A THESI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GRADUATE INSTITUTE IN PUBLISHING

NAN HUA UNIVERSITY



台灣傳記圖書類型及其發展

The Types of Biography and Their Development in Taiwan.

指導教授：齊力 博士

ADVISOR : CHI LI Ph.D.

研究生：李靜宜

GRADUATE STUDENT : LEE CHINGYI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南 華 大 學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出版學研究所

台 灣 傳 記 圖 書 類 型 及 其 發 展

研究生：李靜宜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陳俊榮
應立志
齊力

指導教授：齊力

所 長：應立志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九十二年 六 月 十 日

謝 辭

兩年前的六月，我與南華初相見。兩年後一樣炙熱的六月裡，我與南華道別，帶著完成學業的欣慰與滿足，也帶著豐盈的回憶與感動，迎向下一段人生的歷程。

如期完成論文、順利通過口考，是我在二三年設定的主要目標之一。如今終於達成，心中滿是感動與感激。要感謝的人太多了，除了我自己付出心力與時間，換得知識的成長、完成獨立的研究外，若沒有其他人的支持與幫助，這條路是無法順利走完的，也會備覺孤單。所以，縱使謝辭是一本論文中彷彿可有可無的部分，但我卻很珍惜這樣的機會，能夠利用這篇幅對一些人表達誠摯的感謝。

首先，要謝謝指導教授齊力老師以淵博的知識、耐心的態度，對資質驚鈍的我諄諄教誨，也要感謝口考委員應立志所長與孟樊老師給與我諸多至為寶貴的建議。而在這有苦有樂的兩年研究所生活中，因為有許多可愛的同學為伴，一起學習、成長、共同編織無數精采回憶，而顯得格外充實繽紛。尤其，要特別謝謝研二這一年來互相鼓勵督促的暑畢組夥伴，特別是麗娟、建毅、櫻慧，不僅在論文研撰上提供我許多意見，在我陷入低潮時給與安慰，也在其他層面上帶給我美好的激盪。最後，當然要謝謝家人的支持，若沒有這份安定的力量作為支柱，我無法放心專心貪心地走這一遭。

兩年前，我來；兩年間，我見；兩年後，我征服。這一趟，很值得。

南華大學出版學研究所九十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碩士論文摘要

論文題目：台灣傳記圖書類型及其發展

研究生：李靜宜

指導教授：齊力博士

論文摘要內容：

傳記圖書是一種豐富多樣，且具有歷史性的圖書類型，其發展亦與社會脈動間有一定程度的關係。本研究係以台灣戰後及至二二二年營利出版單位所出版之傳記圖書作為研究對象，希冀透過分類，將為數眾多的傳記圖書分為數個獨立、可辨識的類型，俾使其整體輪廓更為清晰，並觀察類型本身的發展狀況，包括質與量上的變化，且進一步思考其背後所隱含的意義。

本研究選擇以傳記所誌之人物作為傳記圖書分類的標準，將符合研究範圍的六一七部傳記圖書分為十三個類型，並分析其數量增減與內涵的演變。此外，更進一步觀察社會變遷與傳記圖書發展間的關聯。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乃採用文獻研究法，並援引文獻計量學的核心概念，以期能清楚勾勒台灣傳記圖書的發展面貌。

研究發現，五十七年來台灣傳記圖書的出版總數，約占所有圖書出版品的 1.09%，且傳記圖書的所占比率並未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整體而言，在台灣各類型的傳記圖書中，「政治軍事界人物」與「文學歷史界人物」的傳記圖書所占比率最高。至於「商業界人物」、「演藝界人物」、「體育界人物」等類型的傳記圖書，則是於一九九〇年代以後，或說是解嚴以降，方有明顯的成長。最後，本研究乃從「政治力鬆綁」、「經濟力增強」與「價值多元化」等三個面向來探討社會變遷與傳記圖書發展間的關係。

關鍵詞：傳記圖書、分類、傳記圖書的類型、知識社會學

Title of Thesis : The Types of Biography and Their Development in Taiwan.

Name of Institute : Graduate Institute in Management, Nan Hua University

Graduate date : June 2003

Degree Conferred : M.B.A.

Name of student : Lee Ching Yi

Advisor : Chi Li Ph.D.

Abstract

Biography not only possesses historic significance, but it is also a plentiful and diverse type of books. Likewise, the relation between its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ulsation has a certain extent. This research aims at the biographies published by commercial publishers from Second World War to 2002 in Taiwan. A variety of biographies can be divided into several independent and recognizable types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in order to make their entire outline articulate and simultaneously examine the condition of development with respect to these types identities, including a variation of quality and quantity. Moreover, an implicit significance behind them can be further probed.

The research selects the written personages of biographies as a norm of classification. The 6107 pieces of biographies which accord with the scope of research can be classified into 13 types. Furthermore, it examines the quantitative increase and decrease and the qualitative evolution.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 is further to observe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biography. Concerning the methodologies, this research adopts document research and cites the principal conceptions of bibliometrics, for giving an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al aspects in Taiwanese biograph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it is fairly certain that in the last 57 years in Taiwan the publishing amount of biography has taken possession of entire publication of books by 1.09 percent, and there was not a gradual rise year after year with regard to a percentage of biography. Altogether, amongst various types of biographies in Taiwan, the proportions of the

divisions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ersonages and the divisions of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personages are highest. As to the proportions of others such as the divisions of commercial, entertaining and athletic personages, there have been also a marked increase, since Taiwan was after 1990 as well as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martial law ended later. Finally, the research selects three dimension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biography. The three dimensions are emancip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enhancement of economical power, and diversification of values.

Keywords : biography, classification, types of biography, sociology of knowledge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1.2	研究目的	4
1.3	研究對象與範圍	6
1.4	章節安排	10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1
2.1	台灣傳記圖書發展概況	11
2.2	傳記圖書之分類	18
2.3	知識社會學	29
第三章	研究方法	34
3.1	研究程序	34
3.2	文獻研究法	34
3.3	文獻計量學	36
3.4	書目登錄之資料來源與登錄原則	37
3.5	傳記圖書類型的建構	40
第四章	台灣傳記圖書的發展	46
4.1	傳記圖書的整體數據統計	46
4.2	各類型傳記圖書的演變	52
4.3	社會變遷與傳記圖書的發展	69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78
5.1	研究結果	78
5.2	研究限制	81
5.3	研究建議	83
參考文獻		85
附錄一	台灣出版社規劃的傳記相關書系	89
附錄二	戰後至二〇一二年台灣所出版之中國大陸政治軍事界人物傳記圖書	91
個人簡歷		95

表 目 錄

表 1.1	國內以圖書或傳記圖書為研究主題之博碩士論文	5
表 2.1	鄭尊仁對於台灣近代中國人物傳記發展所劃分的三個階段	13
表 2.2	胡適對中國傳記文學的分類	21
表 2.3	謝寶煖之傳記圖書分類	22
表 2.4	亞馬遜書店「傳記與回憶錄」之細類	26
表 3.1	本研究傳記圖書書目登錄之資料來源	38
表 3.2	以傳記人物作為分類標準之分類方式一覽表	41
表 4.1	台灣歷年來傳記圖書占圖書出版總數之比率	48
表 4.2	各年代傳記圖書占圖書出版總數之比率	49
表 4.3	本土創作與翻譯之傳記圖書總數及所占比率	50
表 4.4	傳記圖書出版數最多的出版社	51
表 4.5	各類型傳記圖書出版總數及所占比率	52
表 4.6	各年代各類型傳記圖書之出版總數	58
表 4.7	各年代各類型傳記圖書所占比率	58
表 4.8	解嚴前後各類型傳記圖書之出版總數	62
表 4.9	解嚴前後各類型傳記圖書所占比率	62
表 4.10	各年代出版數量最多與最少的三種傳記圖書類型總數與所占比率	63
表 4.11	解嚴前後出版數量最多與最少的三種傳記圖書類型總數與所占比率	63

第一章 緒論

本章一共包含四個部分，首先，於第一節說明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闡述研究目的，第三節界定研究對象與範圍，第四節則陳述本論文之章節安排。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走進書店，不難發現以各種人物生平事蹟為主題的傳記圖書，林林總總，煞是熱鬧。即將投入重要選戰的政治人物，亟欲透過傳記使選民了解他的成長、奮鬥與理念；步下舞台的政治人物，也經由傳記闡明其成就貢獻或者辛酸委屈，甚至揭露一些不為人知的秘辛。螢光幕上光鮮亮麗的藝人也出版傳記，一訴其成長經驗、心路歷程；商場上叱吒風雲的成功企業家是如何獲致今時今日的財富與地位，亦可洋洋灑灑地以傳記的形式記述之。至於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的傳記圖書，更是從來未曾缺席。而除卻知名的公眾人物外，一般市井小民只要有其特殊之處，似乎也能成為傳記圖書的主人翁。

李孝悌（1993，頁 55）表示：「如所周知，從司馬遷的《史記》開始，記傳體就成為中國正史的主要特色。」蕭關鴻（2002，頁 94）也提到：「用人物傳記來記錄歷史是中國人特有的紀寫歷史的方式，與西方完全不同。」由此可知，傳記圖書有其傳統性與重要性。再者，姑且不論傳記之於中國記錄歷史的特殊性，延古至今，它也是一種讀者樂於閱讀的圖書類型。

英國史學家李雪特（Sidney Lee）曾說：「傳記之興，是饜足人類

紀念的本能。」¹鍾芳玲（1995，頁3）認為：「真實人物的故事與所代表的年代、風潮往往是最吸引人的；而在各個不同的領域，都有值得記載的精彩人物。」²馬耀民（1993，頁20）則表示：「只要人們對他人的生命仍是興致勃勃，想一窺究竟，傳記此文類便仍有可為。」誠然如此，「畢竟人最感興趣的還是人」（謝寶媛，1994，頁61）。某些人物的一生經歷、成功或失敗的經驗，乃至私生活與秘辛，都會引起某部分讀者的興趣。讀者閱讀傳記圖書，或許是為了滿足個人的好奇心，或許是欲以傳記人物作為學習倣效之對象，也可能是想從中獲得一些啟發抑或是感動。不論讀者是抱持著何種心態與目的閱讀及消費購買傳記圖書，傳記「與人性及人類生活密切相關」的特性，使其在書市中總能占據一席之地。

此外，傳記圖書與整個社會大環境的演變之間，亦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相關性。例如，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台灣解嚴以前，一些較具爭議性、敏感性的政治人物傳記圖書數量較少，例如中國大陸政治高層的相關傳記；而在解嚴後，因為政治開放，社會風氣改變，價值觀亦轉趨多元，不僅中國大陸政治人物的傳記數量增加，傳記人物的類型也變得更加豐富。又如，每逢重大選舉，書市中便會出現候選人的傳記，譬如二〇〇二年年底適逢北高市長選舉，眾所矚目的台北市長候選人李應元及馬英九即分別推出其傳記。二〇〇二年，以李應元為撰述人物的傳記圖書有其自傳《人生的驚嘆號》，以馬英九為傳記主角者，則包括了馬西屏《誰識馬英九》、王渡《馬英九現象》及公孫龍策《馬英九！》等。

¹ 轉引自程滄波（1995），論傳記文學，什麼是傳記文學，24頁。

² 轉引自胡梓（1995），解讀傳記圖書的熱潮，書香月刊，52頁。

綜上所述，可知傳記圖書是一種豐富多樣、具有歷史性的，與社會脈動甚為貼近的圖書類型。Marita Sturken 亦表示，傳記定然存在著「文化意義」(cultural meaning)，包括傳記中傳主的形象，以及傳記本身，皆是在社會文化脈絡發展下被詮釋出來的結果，而非原因³。因此，探討傳記圖書的確有其意義。

再者，圖書不僅是人類思想及情感的載體之一、創作者與閱讀者溝通交流的媒介、出版產業中的主要商品，更是出版學研究中至為重要的一環。林穗芳（1998，頁 30）即認為出版學的研究對象包含三者：讀者、出版物、出版業。許力以在論及出版學研究的範疇時，亦表示出版物的研究是一個主要部分。袁亮所主編的《出版學概論》，分章專述出版學之研究內容，其中出版物亦獨占一章⁴。由此可知，在出版學的研究上，以圖書作為對象進行研究實有其必要性。瑞典學者羅森袞（K. Erik Rosengren）亦認為可以經由文化產物，以尋求社會變遷之跡⁵。而圖書，毋庸置疑地即是古今中外最主要的文化產物之一。

台灣雖是一蕞爾小島，然書市中圖書的種類與數量一直以驚人的速度逐年增加。根據《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出版年鑑》的統計，台灣二〇〇一年出版的圖書多達 36,546 種。回顧文獻，亦知一九八六年台灣所出版之圖書數量即已破萬，一九九四年超過兩萬，一九九八年則突破三萬種。而根據非正式的統計，二〇〇二年台灣的圖書出版總數甚至高達四萬種以上。面對數量如此龐大、類型豐富多樣的圖書，值

³轉引自黃明賞（1999），從新聞寫作到傳記寫作 - 記者角色的一個時代性觀察，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20 頁。

⁴轉引自余敏主編（2002），出版學，中國書籍出版社，43 頁。

⁵轉引自廖梅馨（1999），圖書出版產業類型之探析，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 頁。

得研究的面向與課題眾多，但以筆者一人之心力實無法悉數分析探討之。是故，根據傳記圖書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以及筆者個人的研究興趣，乃擇定以「傳記圖書」為研究對象。

1.2 研究目的

如前所述，圖書在保存、傳遞人類思想與情感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其反映時代與社會的功能亦不容忽視。不過，國內以「圖書」為研究主題的博碩士論文，在數量上甚為有限。雖然文史領域中的研究論文常涉及圖書的範疇，但多是以作家與其作品為研究對象，而非針對圖書本身。國內的出版學研究所、傳播研究所等學術單位所進行之研究，對於出版相關之各個面向，如出版業的經營管理、行銷通路與行銷策略、圖書消費行為等範疇都累積了一些研究成果。不過，以圖書為主題的研究，其所占比率顯然還是比較小的。經過搜尋，僅有許峻彬（2000）《從書籍出版分析台灣傳播學的發展》、陳威志（2000）《Robert Darnton 的書中書——論十八世紀的作者、讀者及書籍》、郭姿吟（2001）《明代書籍出版研究》及王乾任（2002）《台灣社會學書籍出版史研究：1951-2000 年》等研究與圖書本身有較為直接的相關。如表 1.1 所示。

至於以傳記圖書作為研究對象的博碩士論文數量更為稀少。同樣地，文史系所的相關論文仍多為針對作者與其傳記作品的分析研究，如廖卓成（1986）《梁啟超的傳記學》、胡欣怡（2002）《胡適的傳記文學研究》，而明確地以傳記圖書作為研究主題的當屬鄭尊仁（2002）的博士論文《近代中國傳記文學研究——以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九九年台出版之個人傳記為對象》。此外，傳播領域中，亦有與傳記圖書

相關之研究，如張永政（1996）《讀者閱讀政治人物傳記式書籍之印象研究——以《李登輝的一千天》為例》、黃明賞（1999）《從新聞寫作到傳記寫作——記者角色的一個時代性觀察》。茲整理如表 1.1。

表 1.1 國內以圖書或傳記圖書為研究主題之博碩士論文

以圖書為研究主題		以傳記圖書為研究主題	
筆者（年代）	論文名稱	筆者（年代）	論文名稱
許峻彬（2000）	《從書籍出版分析台灣傳播學的發展》	張永政（1996）	《讀者閱讀政治人物傳記式書籍之印象研究——以《李登輝的一千天》
陳威志（2000）	《Robert Darnton 的書中書——論十八世紀的作者、讀者及書籍》	黃明賞（1999）	《從新聞寫作到傳記寫作——記者角色的一個時代性觀察》。
郭姿吟（2001）	《明代書籍出版研究》	鄭尊仁（2002）	《近代中國傳記文學研究——以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九九年在台出版之個人傳記為對象》
王乾任（2002）	《台灣社會學書籍出版史研究：1951-2000 年》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根據筆者的蒐集整理，可知台灣以圖書或傳記圖書作為研究對象的學位論文為數甚少。然而，承上所知，針對圖書本身進行研究有其重要性，傳記圖書亦有研究之價值。是故，筆者乃以傳記圖書為研究對象，希冀進行較為深入的相關探討。

研究圖書出版品，可以嘗試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切入，而若欲以傳記圖書為研究對象，亦有多種探討的可能。鄭尊仁（2002）《近代中國傳記文學研究——以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九九年在台出版之個人傳記為對象》中，乃是以一九四五至一九九九年間，台灣地區出版之第三人稱中國近代人物傳記為研究對象，而排除自傳、合傳、外籍人士傳記、名人錄、哀思錄、紀念文集、年譜等。他是從文學的角度檢視

其研究對象，並針對傳記文學理論、傳記文學形式及內容進行分析探討。

至於本研究選擇的角度，是希冀將歷年來為數眾多的傳記圖書分為數個獨立、可辨識的類型，俾使其整體輪廓更為清晰，並觀察類型本身的發展狀況，包括質與量上的變化，且進一步思考其背後所隱含的意義。

前文曾提及，瑞典學者羅森袞認為可經由文化產物以尋求社會變遷之跡。此乃因文化產物脫離不了社會，它是在社會所提供的條件下產生的。同時，文化產物也可能反過來影響社會。是以，文化產物與社會的關係至為密切。至於文化產物中的圖書，或者再縮小範圍至本研究對象的傳記圖書，其和社會間當然亦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相關性。在將台灣傳記圖書劃分為數個獨立類型，並觀察其質與量的變化後，或可窺得一些明顯的變化軌跡，而這些軌跡，又或者與社會有著某種程度的關係。關於這個部分的探討，筆者希望於「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knowledge) 的觀點下進行闡述分析。

綜上所言，本研究之目的乃是欲透過分類的動作，將台灣傳記圖書分為若干類型並檢視其發展，從而對台灣傳記圖書長時間的演變有所了解，並進而探討這些發展演變背後所蘊涵的意義。

1.3 研究對象與範圍

本研究以傳記圖書作為研究對象，為避免產生概念混淆或相關字詞定義不明之情況，須先為其做一名詞界定。再者，本節亦將進一步說明研究範圍。

1.3.1 名詞界定：傳記圖書

傳記圖書者，即是內容為傳記的圖書。因此，在名詞界定上，須先了解「傳記」之確切意涵。

首先，參考辭典與百科全書對傳記所下之定義。台灣中華書局編纂之《辭海》(1980)解釋傳記為：「1.通謂記載之文字，別於口說而言。漢書劉歆傳：『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2.專指記述個人事蹟之文字。四庫全書史部有傳記類，凡聖賢年譜、名人諫錄、名臣事略，皆屬之。」由上可知，第二個定義較符合我們目前一般所言之傳記。三民書局編纂之《大辭典》(1985)則定義傳記為：「文體的一種，也單稱為傳。以記載人物事蹟為主的文章。」

《大美百科全書》(1990)提到，傳記此文類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許多不同的形式，實難賦予其一個定義涵蓋所有重要的傳記體例，所以其可廣泛定義為「真實生活的記錄」。然惟其種類繁多，包括個人功業的類纂、經驗的陳述及心理的描寫，是以，「只要內容是真實生活的記錄，便可以歸為傳記類文體。」《簡明大英百科全書》(1988)則將傳記定義為：「以個人生活為主題的非虛構性文學，包括作者描述自己生活經歷的自傳在內。」

在學位論文方面，廖卓成《梁啟超的傳記學》中，採取「記述人物生活始末的文字」作為傳記之定義。然生活始末，所記者不一定必須為人物的完整一生，生活片段亦屬之。廖卓成(1986,頁2)表示：「傳記有多種體裁，如史傳、家傳碑志、年譜、學案等等；從不同的觀點著眼，可以有不同的分類。」張永政(1996)《讀者閱讀政治人物傳記式書籍之印象研究——以《李登輝的一千天》為例》，則將傳

記定義為「記述人物生活或評論人物以傳後世之著作。」(頁3)

在其他文獻中，亦有針對傳記定義加以陳述者。如朱文雄(1978, 頁3)表示：「傳記，是個人生平事蹟的敘述。」馬耀民(1993, 頁18)則認為：「傳記一般乃指傳記作者對傳主生平與生活的描述或記錄。」

胡欣怡(2002, 頁36-37)《胡適的傳記文學研究》中，亦對傳記歷來之定義做了頗為詳盡的歸納整理。她表示，傳記一詞自古有之，最初之涵義乃是對於經書內容的解釋。《文心雕龍·史傳》中即言：「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傳於後，實聖文之羽翮，記載之冠冕也。」可知，「傳」字一詞原具有訓詁之意義。直至西漢司馬遷之《史記》寫成，其中「本紀」、「列傳」中的篇章對於後世撰史之影響甚深，傳記一體的撰寫內容始定，逐漸成為一種以記述人物為主的獨立文體。

綜合以上各家提出之定義，可知傳記最主要的內容在於記述「人物」的生平事蹟與生活片段，而「非虛構性」也是一個必要的構成元素。例如，以歷史人物作為主人翁的小說即不歸屬於傳記的範疇內。然而，所謂的非虛構性其實是較難以評斷的一個標準。有的傳記隱惡揚善、採取選擇性的立場撰述；有的傳記真真假假、虛實參半。於此之間，除了所謂的虛構或真實之外，實有一模糊地帶。但是傳記在撰寫上，其形式與虛構性質的小說原本即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將傳記圖書定義為「在寫作形式上非為虛構的記述人物生平與生活之圖書作品」。

1.3.2 研究範圍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傳記圖書類型及其發展，在橫斷面部分，企圖將傳記圖書分為不同之類型；在縱斷面部分，則是希冀觀察分析各類型的發展狀況。而為了研究之便，對於時間範圍乃有所界定。

一般在撰述討論台灣出版史時，大致上有兩個可作為起始點的時間。一是以一八七七年（清嘉慶十二年）為起點，此乃是因為一八七七年，台灣鎮總兵官武隆阿曾刻銅活字印《聖諭廣訓注》，應為台灣最早的出版紀錄（辛廣偉，2000，頁2）。另一個是以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脫離日本統治作為開端，因為台灣的中文圖書出版主要是於戰後開始發展。考量研究主題的性質，筆者選擇以戰後為起始點，探討一九四五至二〇二二年，五十七年來台灣傳記圖書類型的發展。

此外，戰後以降台灣地區出版的傳記圖書數量甚多，有營利性出版社所出版者，有個人為了紀念先人或為自己生平做個記錄而以自費形式出版者，有學術機構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為了保存歷史而整理的一系列口述歷史傳記。然而，性質不同的出版單位，其於出版傳記圖書的目的和類型上必然有所差異。筆者乃基於文獻蒐集上的考量，以及研究上恐無法面面俱到地針對各種性質相異之單位所出版的傳記圖書做一深入剖析，故選定台灣地區營利性出版單位所出版之傳記圖書以為研究範圍。

根據以上考量，本研究中所蒐集整理的傳記圖書書目，乃限定為台灣營利性出版單位所出版者。非以出版圖書營利為目的之單位，如國防部總政治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史館，大學院校出版

之學術著作，民間非營利單位等出版之傳記圖書、族譜、非賣品，及為紀念亡故之人而編輯之紀念集等皆不在研究範圍中。此外，由於童書的屬性較為不同，亦不納入研究範圍裡。而個人自費出版的傳記圖書，亦摒除於研究範圍外。

以上所述之不屬於本研究範圍中的傳記圖書，其在數量上相較於營利性出版單位所出版的傳記圖書是比較少的，所占比率並不高。這是必須加以說明的一點。

1.4 章節安排

本論文旨在探討台灣傳記圖書的類型及其發展，在章節上的安排如下：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研究對象與範圍，以及章節安排。第二章為「文獻探討」，包括對於台灣傳記圖書發展概況之整理、傳記圖書類型之分析，以及對知識社會學意涵的了解。第三章為「研究方法」，說明本研究採用何種方法以達成研究目的、解決研究問題。第四章為「台灣傳記圖書的面貌」，主要分析台灣傳記圖書各類型在質與量上的發展演變，並以知識社會學的觀點詮釋之。第五章則總結研究結果，說明研究上的限制，並提出研究建議。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根據第一章「緒論」對於研究目的、研究對象與範圍的釐清，在第二章「文獻探討」中，筆者乃進一步檢閱與研究相關的文獻並歸納整理之。本章共包含三個部分，首先，於第一節中根據現有文獻，陳述台灣傳記圖書的發展概況；第二節，針對傳記圖書之分類方式與類型做一整理；第三節則探討知識社會學的意涵。

2.1 台灣傳記圖書發展概況

本節中，筆者希冀透過對於既有文獻的探討，以概略了解台灣傳記圖書發展的脈絡與歷程。文獻資料的來源，主要是國內學術論文以及與出版相關之期刊雜誌。

在搜尋相關文獻後可得知，台灣的學術論文中以傳記為研究對象者數量並不多，大部分為歷史、中外文學領域之研究，且多為針對單一文本、作者之分析。例如：郜一如（2001）《勒·克萊齊歐的一部雙人傳記：「狄亞哥與芙麗坦」之探討》，徐圓貞（2001）《李白詩作之旅遊心理析論——以揚州系列的傳記論述為例》等。諸如此類的論文，與本研究較無直接關聯性。與台灣傳記圖書之發展較具相關性的學術論文，包括張永政（1996）《讀者閱讀政治人物傳記式書籍之印象研究——以《李登輝的一千天》為例》、黃明賞（1999）《從新聞寫作到傳記寫作——記者角色的一個時代性觀察》，以及鄭尊仁（2002）《近代中國傳記文學研究——以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九九年台出版之個人傳記為對象》。

至於期刊雜誌中與傳記圖書相關的文章，多為反映當時書市現象

之報導及評述，但若能歸納整理各個時間點上針對傳記圖書發展現象之描繪，亦可窺知台灣傳記圖書發展之大致面貌。為了解台灣傳記圖書之發展概況，茲列舉相關文獻之內容如下。

鄭尊仁（2002）《近代中國傳記文學研究——以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九九年台出版之個人傳記為對象》，乃依據時代特徵，將一九四五至一九九九年台灣傳記的發展分為三個主要時期。第一個時期為一九四五至一九六九年，是為「教育與宣傳的年代」。於此時期出版的傳記大致上皆遵守著幾個主要方向（頁 230）：1.反共；2.宣傳與教育；3.若行有餘力，則再進行一些考證。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傳記所描述之傳主幾乎都為非台灣省籍的人物。鄭尊仁認為，這並非偶然的現象，而是有意之下的狀況。第二個時期，為一九七一至一九八九年，此時期的特徵為「思想控制下的困頓」。這個階段中，雖然以所謂先賢先烈作為傳主的傳記圖書數量仍不少，但以台灣人士為傳主之傳記亦逐漸興起。而一九八八年後的政治尺度日漸寬鬆，加上圖書出版已步入文化工業階段，舊式的、宛如國家宣傳機器的某些傳記圖書也不得不退出讀者導向的市場（頁 247-248）。第三個時期，則是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九年，這個階段的主要特徵是「內容與形式的改變」，傳記圖書則呈現欣欣向榮、一片百花齊放之盛景。在傳記圖書所呈現的趨勢上，大致包括以下數點：1.關心台灣本土的人物；2.記者參與寫傳；3.人物職業多樣；4.積極介入政治運作；5.大陸地區作品數量漸增等。

國內既有文獻中針對台灣的傳記圖書進行歷時性分析者，以鄭尊仁的研究較為完整。雖然其僅是以近代中國人物的傳記為主要觀察對象，但亦具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茲整理如表 2.1。

表 2.1 鄭尊仁對於台灣近代中國人物傳記發展所劃分的三個階段

階段 / 年代	特徵
教育與宣傳的年代：一九四五至一九六九年	1. 方向上，以反共、宣傳與教育、考證為主。 2. 撰述人物，幾乎皆為外省籍人士。
思想控制下的困頓：一九七 至一九八九年	1. 以台籍人士為傳主之傳記開始出現。 2. 歌功頌德、描寫先賢先烈事蹟之傳記亦有之。 3. 此階段末期，出版走向文化工業階段，不符市場之傳記圖書逐漸淡出。
內容與形式的改變：一九九 至一九九九年	1. 關心台灣本土的人物。 2. 記者參與寫傳。 3. 人物職業多樣。 4. 積極介入政治運作。 5. 大陸地區作品數量漸增。

(資料來源：鄭尊仁，2002)

除了鄭尊仁以近代中國人物傳記為檢視對象，分析戰後以降各階段的發展外，亦有許多文獻針對特定時期、特定年代的傳記圖書發展進行討論。

曹韻怡（1990，頁 66）在《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出版年鑑》中，專文介紹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年的非文學類圖書出版概況，提到解嚴對於圖書出版的諸多影響，其中包括一些原本罩著一層神秘政治色彩的議題與人物書籍得以出版，如司馬桑敦所著之《周恩來傳》、吳晗的《朱洪武傳》。而人物類傳記亦於同時崛起。她特別提出一九八九年四月由天下出版社所出版的《孫運璿傳》，及同年十月聯經出版社所出版的《林語堂傳》為例說明此一現象。前者上市後更獨占金石堂非文學類暢銷書排行榜榜首達半年之久，可見其受歡迎之程度。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的《誠品閱讀》裡，李孝悌（1993，頁 55）指出：「傳記作品大量出現，成為最近出版界的一大景觀。這些作品

不僅在數量上引人矚目，在題材上也是百花齊放、無所不包。」他並認為，透過形形色色的傳記，也可探知台灣政治文化的變遷。例如，以蔣經國為傳主的一系列傳記圖書，反映了強人不再的事實；而李登輝的數本傳記，則顯示出國民黨內不同流派間的鬥爭。

同樣的，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的《文訊》中，胡衍南（1993，頁25-26）也表示：「走進書店，沒有人會懷疑這幾年燃起的傳記熱；讀者大眾以驚人的消費力，回應了出版界推出的一波波名人傳記。」這為數眾多的名人傳記主角，包括兩岸的政治要人、國內著名企業家、軍事將領及影藝名人等。許多出版社，如業強出版社、黎明文化、國際文化等，且推出甚具規模的傳記出版計畫。胡衍南並進一步思索現象面背後的意涵，認為一九九〇年代興起的傳記熱風潮，在實質上應該有頗堪玩味的社會心理。或可說，政治上的解嚴，使得傳記圖書如同其他文化生產一樣，以一種積極的態勢，希冀填補讀者長時間的思想空白。而這股傳記熱風潮，基本上可以天下出版社於一九八九年所出版的《孫運璿傳》熱賣狂銷作為一個起點。

一九九四年四月的《出版流通》中，張瀚菁（1994，頁9）表示，提到一九九三年的圖書市場，則斷不可忽略傳記類圖書的「發燒」現象。她舉了麥田出版社的運動家傳記系列，及其他出版社的企業家傳記、科學家傳記為例，說明該年度傳記圖書受矚目的景況。然而，在熱鬧紛陳的傳記圖書中，於話題性和銷售成績上最為突出的，當屬政治名人傳記。因為解嚴之故，出版尺度開放，加上一九九二年年年底適逢毛澤東百年冥誕，引發與中國大陸政治人物相關的出版熱潮，台灣出版界也在一九九三年趁勢推出了十多種毛澤東的傳記圖書。而像是

周恩來、胡耀邦、趙紫陽、朱鎔基等人的傳記，也相繼出版。此外，因為麥田出版社在年初出版周玉蔻所著的《李登輝的一千天》締造了極佳的銷售成績，連帶使得其他出版社紛紛跟進推出國內政治人物如連戰、林洋港、宋楚瑜等人的傳記。

一九九五年十月的《書香月刊》中，胡梓（1995，頁2）在「解讀傳記圖書的熱潮」一文裡，開門見山地指出：「近幾年來，台灣的出版市場一直對傳記類的出版品保持高度的興趣。」而這其中，尤其以伴隨著選舉而出版的政治人物傳記最值得注意，他並訪談了一些出版人討論這樣的現象。新新聞出版社經理詹靜如表示，傳記圖書始終有其一定的市場，特別是具有知名度的人物之傳記，更容易成為暢銷書。月旦出版社的總編輯鍾芳玲則認為，政治人物傳記出版的熱潮是可以理解的現象，或許是由於解嚴釋出了政治力、社會力，以往政治上的禁忌不再是禁忌，方使書市顯得格外熱鬧。

藍如瑛（1995）於「九十年代台灣人物傳記出版生態初探」一文中提到，傳記已成為一九九〇年代台灣出版界的新寵。而一般在論及這波傳記熱潮的萌發時，是以周玉蔻《李登輝的一千天》創造銷售佳績為起點。不過，藍如瑛表示，這股傳記風潮其實可推溯至一九八九年的《孫運璿傳》。

張永政（1996）的論文《讀者閱讀政治人物傳記式書籍之印象研究——以《李登輝的一千天》為例》，主要研究的是讀者在閱讀政治人物傳記前後對該政治人物的印象差異。他在第一章「研究背景」中，針對一九九〇至一九九六年間台灣出版之人物傳記圖書進行統計分析，得到三點此時期較值得注意的現象（張永政，1996，頁11-14）：

一、企業家傳記的出版比率，有逐年增加的趨勢。二、運動家傳記的出版比率，有逐年增加的趨勢。三、在此六年間，政治人物傳記的數量皆為各年傳記圖書之首，可見其為該時期傳記圖書出版的主流。

一九九七年五月的《出版界》中，吳興文（1997，頁 24）分析一九九五、一九九六年圖書出版業概況，也特別凸顯出「報導總統候選人書籍」的風潮，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總統候選人的傳記，如《少年李登輝》、《誠信——林洋港回憶錄》、《徹悟：細說陳履安》與《你不知道的彭明敏》等。

林淑儀（1998，頁 10-11）在一九九八年十月的《出版流通》中表示，傳記圖書為台灣書市帶來了一股新氣象。企業家如陳由豪、沈慶京、嚴長壽等人的傳記，以及李敖的傳記，與政治人物如陳水扁、馬英九的傳記，在景氣不佳的書市中仍然有不錯的銷售量。

一九九八年金石堂書店所票選的年度十大出版新聞中，「傳記熱持續發燒」成為上榜新聞之一，其中《總裁獅子心》及《張忠謀自傳》並獲選為該年度最具影響力的書。

黃明賞（1999）的論文《從新聞寫作到傳記寫作——記者角色的一個時代性觀察》，陳述重大選舉與政治人物傳記圖書出版間互為因果、相輔相成的關係，並探討媒體及政治間的互動，以及記者從新聞寫作到傳記寫作上的角色轉換。黃明賞（1999，頁 51）引述楊力宇的話指出：「撰寫政治人物的傳記之熱潮，始於一九九二年的《李登輝的一千天》。」黃明賞（1999，頁 14）根據自己的觀察，亦認為一九九二年是「台灣本島政治菁英傳記發軔主要的時間分期」。他並歸

納一些評論者的觀點，指出周玉蔻所撰之《李登輝的一千天》，是台灣首部強調深度內幕（in-depth story）的政治書（頁 13）。黃明賞強調，在解嚴後對於政治人物傳記的出版真正造成強烈衝擊的，是重要選舉的開放民選，其使得政治人物傳記圖書從書寫過往人物，轉而移轉聚焦於當下的重要選舉候選人。

何飛鵬（2002，頁 252）在為文剖析二〇〇〇年的非文學類出版市場時，提到該年度「平民傳記的興起」，包括本土作品 皇冠出版社所出版的《乞丐囡仔》、《流氓教授》，及日文翻譯書 圓神出版社所出版的《五體不滿足》等，都有極為亮眼的銷售成績。

鄭尊仁（2002，頁 58）針對一九九〇至一九九五年七月間金石堂連鎖書店的暢銷書排行榜進行分析，得出政治人物傳記圖書所占之比率超過總數的一半。這結果充分顯示，讀者對於政治人物傳記圖書的高度興趣。

總結以上相關文獻，可以歸納出兩個結論：一、一九九〇年代，傳記圖書在台灣書市中絕對是一種不可忽略的圖書類型。以各種人物為傳主的傳記圖書受到讀者的青睞，在銷售量上屢創佳績，知名人物的傳記圖書更具備成為暢銷書的極大潛力。二、在燦然雜陳的傳記圖書中，政治人物的傳記尤其受到矚目，一九八九年天下出版的《孫運璿傳》與一九九三年麥田所出版的《李登輝的一千天》，皆被認為具有某種指標性的意義。

然而，筆者發現，與台灣傳記圖書之發展的相關文獻，多著重於一九九〇年代以後，一九九〇年代前甚少有文獻對於當時之傳記圖書

概況加以著墨。這樣的現象，是否表示自一九九〇年代以降，台灣的傳記圖書在題材與數量上確實皆有突破性的發展，是以格外受到注意？此外，亦有論者認為，一九八七年的解嚴，對於傳記圖書的發展，尤其是政治人物傳記圖書的出版，確有深刻的影響，而事實上是否可以如此推論？這些問題，都可再進一步地探索。

2.2 傳記圖書之分類

分類，即是歸類，其定義為：「把具有共同特點的個體對象歸入一類，並把具有共同特點的類集成類的思維過程和方法。」（中國大百科全書·礦冶卷）Bruner、Goodnow 和 Austin（1956）則認為，分類可以降低環境的複雜性，幫助我們分辨世界中的事物，且讓知識顯得有順序、有層次、有組織。事實上，不論是有無自覺、有意無意，人是習於為生活中的諸多事物或抽象概念進行分類的。例如把一年分為四季，把情感分為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等。

分類的概念在生物學與社會學的範疇中亦被廣泛地採用，但基本上，它可以應用於各種學科知識中。在專門的學科知識中使用分類的方法時，理應符合嚴格邏輯的要求，亦即：一、所有類別的總和，必須涵蓋被分類的所有事物；二、任何兩個類別間不應存在具共通性的事物。例如，歸屬為甲類的事物，就不應有被分類至乙類的可能性。（簡明大英百科全書，1988）然而，這種對於分類的嚴格邏輯要求，並無法適用於每一學科，在圖書的分類上尤其有遵循的困難之處。

為了探討台灣傳記圖書之類型及其發展，本研究亦希望運用分類的概念將戰後及至二〇〇二年間，台灣地區營利出版單位所出版之為數可觀的傳記圖書，劃分為數個獨立、可辨識的類型，再觀察各類型

中數量以及內涵的變化，以便更有系統地了解台灣傳記圖書的發展狀況。同時，類型的本身也即有其意義存在。因此，將傳記圖書予以分類，是本研究中一個必要的程序。

然而，傳記圖書究竟可以分成哪些類型？又應該以什麼作為分類的準則呢？關於這個問題，筆者不能單憑個人直覺或喜好對其進行分類，即使理論上難以建構一個十全十美、毫無瑕疵的傳記圖書分類方式，但是仍然必須有所依據。是故，在分類之前須參考各種角度的分類方式，探討其特色，評估其應用於本研究中可擷取的優點、或無法應用於本研究之因素，方能進行適切的傳記圖書分類。以下，茲分別概述幾種傳記圖書分類的方式。

2.2.1 圖書館之分類方式

圖書館乃是「將人類思想言行的各項紀錄，加以蒐集、組織、保存，以便於利用的機構。」(王振鵠，1990，頁43)不論是蒐集、組織，或是保存，這些圖書館中的珍貴資料，尤其是圖書，都須經過適當的分類整理，方能有系統地便於圖書館員的作業以及讀者的利用。

目前，在台灣使用最普遍、已成圖書館對於中文圖書分類之統一標準的是賴永祥一九八九年出版之《中國圖書分類法》增訂七版。「中國圖書分類法」將中文圖書分為十大類，傳記歸屬於「史地類」之下，類號為780至789。780為傳記，781為世界名人合傳，782為中國人傳記，783為亞洲名人傳記，784為歐洲名人傳記，785為美國名人傳記，786為非洲名人傳記，787至789為各種名人合傳。

賴永祥提出的中國圖書分類法有其優點，例如「分類體系適合國

情」，「標記單純易於排列」，「層累分明富於彈性」等，但亦有其缺失，如「類目分配，繁簡不均」，「參見太多，易生困擾」等(黃淵泉，1986，頁 285-286)。

本研究所探討的主要內容並非圖書館之圖書分類法，僅是提出其分類作為參考，是以並不進一步詳述其優劣、分析其得失。若欲採用中國圖書分類法中對於傳記圖書之分類方式以歸納台灣傳記圖書，進行歷時性的分析，恐怕只能得出中外人物傳記圖書各年之出版數量及其增減，卻無法顯現出其他層面的變化，故本研究不採取此分類方式。

2.2.2 以傳記的體裁或寫傳者作為分類標準

所謂的體裁，指的是文章內容呈現於外的表現形式，在不同的基礎下有不同的分類方式。例如，一般而言，文章可以分為論說文、抒情文、記敘文等；而論及中國文學則可分為詩、詞、曲、小說等。基本上，體裁即是文體的呈現。至於傳記的寫傳者則為寫作傳記的人，如為自己作傳者或為他人立傳者。在許多文獻中，都可見到以傳記的體裁或寫傳者作為概略區分傳記的標準，以下茲針對所蒐集之文獻內容略作介紹。

廖卓成(1986)《梁啟超的傳記學》，整理剖析民初文人梁啟超於傳記學各面向的成果與貢獻。梁啟超學識淵博，涉獵廣泛，不但有大量的傳記著作，亦撰有為數頗豐之傳記理論。蕭關鴻(2002，頁 96)即認為，梁啟超是中國傳記由傳統過渡到現代的過程中，貢獻最大、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廖卓成(1986，頁 7-9)的研究指出，梁啟超認為傳記可分為五類：列傳、年譜、專傳、合傳、人表。列傳一詞，乃出自於司馬遷的《史記》，梁啟超指出：「凡是一部正史，將每時代

著名人物，羅列許多人，每人給他作一篇傳。所以叫做列傳。」¹年譜者，是依照年代，詳細記錄譜主之生平事蹟。所謂的專傳，指的是「獨立成為專書的傳」(廖卓成，1986，頁8)。合傳者，乃是傳記中的傳主不僅止於一人。人表一體，是指將一些未能被作傳者的人名以表的形式整理羅列之。

梁啟超之後，對中國傳記之發展影響最深、甚具代表性的人物，乃是另一位文人胡適。蕭關鴻(2002，頁98)認為，若說中國傳記的轉型是萌發自梁啟超，那麼，則可說是完成於胡適。一九三五年，胡適在一場名為「中國的傳記文學」的演講中，即將中國的傳記文學區分為「他人做的傳記」和「自己做的傳記」(胡欣怡，2002，頁56)，而兩大類之下又可再分為若干細類，茲整理如表2.2。

表 2.2 胡適對中國傳記文學的分類

他人做的傳記	自己做的傳記
1.小傳	1.自序的小傳
2.墓志	2.自傳的詩歌
3.碑記	3.遊記
4.史傳	4.日記
5.行政	5.信札
6.年譜	6.自傳年譜
7.言行錄	
8.專傳	

(資料來源：胡欣怡，2002)

除了梁啟超、胡適這兩位文人學者對於傳記的分類外，在其他文獻中亦可見到以體裁或寫傳者作為傳記分類準則的分類方式。

¹引自廖卓成(1986)，梁啟超的傳記學，台灣大學中文所碩文論文，7頁。

朱文雄（1978，頁 3）表示，傳記可依著作者的不同區分為自傳與人傳。若從出版時間來分類，則可分為一般性的傳記、追溯性的傳記，與現時性的傳記。

杜維運（1984，頁 39）認為，傳記大致可分為長傳、短傳與類傳。所謂的長傳，書寫的傳主主要是攸關歷史轉變的重要人物，在傳記的形式上務求詳盡、鉅細靡遺。傳主之人物性格、所處之背景時代，也應做細膩完整的敘述。至於短傳，當可記寫「有真性情真貢獻而名位並不顯赫之人」（頁 41），在寫法上則不似撰寫長傳那般力求詳盡，而是擇其要者，斟酌取捨。而所謂的類傳，乃是所記之傳主不只一人，而且不必然是極為特殊之人物，如中國正史中的儒林傳、文苑傳等即為類傳。

表 2.3 謝寶媛之傳記圖書分類

傳記圖書	自傳	正式自傳	告解型自傳，自我辯護型自傳 自剖型自傳，好為人師型自傳	
		非正式自傳	日記、書信、回憶錄	
	他傳	分傳	根據第一手資料寫成的傳記	
			依據研究編寫的傳記	資料性傳記、評傳、標準傳記、闡述性傳記、小說化的傳記、傳記式小說
			特殊目的傳記	文訟之作、應聲之作、競選傳記、哀誄之作、信徒之作
		列傳（合傳）		
總統傳記				

（資料來源：謝寶媛，1984）

謝寶媛（1984）在 傳記資料之利用 一文中，依照寫傳者身分，

將傳記圖書分為自傳和他傳，又特將「總統傳記」獨立為一大類，故共為三大類。而此三大類，又可再分為若干細類。表 2.3 為整理自謝寶煖的傳記圖書分類方式所擬之架構。

鄭尊仁（2002）分別以「體式」與「組織」將近代的中國傳記文學分成數類。所謂的體式，乃是「作者在有意或無意之間所採取的作傳方式。」（頁 73）而組織則為作者在敘述人物生平時所採取的結構。體式部分，可分為：1.史學論文式，2.回憶錄式，3.人物評論式，4.工作履歷式，5.史事敘述式，6.資料收集式，7.紀念文集式，8.掌故稗官式等八類。在組織部分，則可分為：1.編年式，2.分割板塊式，3.插敘式，4.倒敘式，5.獨立事件式等五類。

2.2.3 以傳記人物作為分類標準

以傳記人物作為分類標準，是另一種常見的傳記圖書分類方式，以下茲就所蒐集之相關文獻做一整理敘述。

朱文雄（1978，頁 3）當代人物傳記與現代青年 一文中提到，依據傳主所屬之專門人才的種類劃分，傳記可大致分為六類：1.科學家傳記，2.政治、外交家傳記，3.文化、教育、圖書館工作者傳記，4.文藝作家、詩人傳記，5.音樂、戲劇家傳記，6.工業、商業家傳記。

張永政（1996）的論文《讀者閱讀政治人物傳記式書籍之印象研究——以《李登輝的一千天》為例》，則將傳記人物分為十二類：1.政治人物，2.皇帝，3.妃女，4.企業家，5.文史學家，6.藝術家，7.科學家，8.宗教與思想家，9.演藝人員，10.運動，11.其他及 12.合輯。他是先瀏覽過所整理出的人物傳記書目（一九九〇至一九九六年，共

一三四九冊)，再將數量較大且較可能具特別意義者定為一類。不過，除了上述說明外，他並沒有進一步解釋如此分類的理由。

國內最具代表性的網路書店「博客來網路書店」在傳記圖書的分類上，亦是採取以人物作為分類標準的方式，本研究也將其分類方式列入參考中，在此略作介紹。

書店與圖書間的密切關係不言可喻。在中國，西漢末期即出現了供人買賣圖書的書肆；在希臘，更早自西元前五世紀就有書肆的存在（林穗芳，1998，頁 8-9）。不管是過去的書肆、早期的傳統書店、後起之大型連鎖書店，或是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以後對圖書消費影響甚鉅之網路書店，書店一直是讀者最便於獲知圖書資訊以及購買圖書的場所。為了方便讀者搜尋圖書，一些大型連鎖書店乃將圖書分類陳列，以傳記圖書而言，一般書店多將其歸屬為史地類。而網路書店由於其超連結的特性，可蒐羅大量圖書資訊，因此在圖書的分類上更為精細，使讀者可以針對感興趣、或需要的細類搜尋圖書。因此，本研究乃列出國內外兩大網路書店的傳記圖書分類方式以為參考。本節中介紹以傳記人物作為分類標準的博客來網路書店，下節則會說明亞馬遜網路書店（amazon.com）的傳記圖書分類方式。

博客來網路書店成立於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一九九六年七月底正式上網營運，是華文世界第一個網路書店，其資料庫中約有二十萬筆的圖書資料²，並依其屬性分門別類羅列，以便讀者查詢。本研究以博客來網路書店的圖書分類作為參考來源之一的理由有二：一、博客

² 資料來源：賴志偉（2000），網路行銷中客戶導向策略之研究——以亞馬遜網路書店為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7頁。

來網路書店為台灣第一家純網路書店³，且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

二、其圖書分類較為精細，較符合本研究之立意。

博客來網路書店的圖書類別中列有「人物傳記」一類，其歸屬於「文學」類之下。人物傳記又分為十一小類：1.文學家，2.思想哲學家，3.藝術家，4.運動家，5.企業人列傳，6.理財大師列傳，7.影視人物，8.科學家，9.政治人物，10.軍事人物，11.其他。

博客來網路書店對於傳記圖書的分類，與朱文雄、張永政的分類方式相似，皆是能從類別名稱一望即知其囊括的人物傳記圖書可能涵蓋哪些，是一種較便於讀者搜尋圖書的分類方式。

2.2.4 其他分類方式

除了前述幾類較為常見的傳記圖書分類方式外，尚有其他較難以被歸類或較為特別的分類法，如亞馬遜網路書店對於傳記圖書的分類、黃明賞（1999）的論文《從新聞寫作到傳記寫作——記者角色的一個時代性觀察》對於政治人物傳記的分類，以及 Stephen B. Oates（1986）以「寫作者在傳記中所處之位置」對傳記圖書的分類，在這個小節中將會一一加以介紹。

亞馬遜網路書店於一九九五年七月成立後，迅即成為全世界圖書書目最齊全豐富的另類「書店」。因其並非實體書店，乃是透過網路資料庫建置的便利性，使其擁有超過四百萬筆的大量圖書資料⁴，可

³ 網路書店依其經營方式可分為：純網路書店（如博客來網路書店）、出版社經營之網路書店（如遠流博識網）、實體書店經營之網路書店（如金石堂網路書店）。

⁴ 參考資料：詹韻如（2000），網路企業評價——以亞馬遜網路商店為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碩士論文，32 頁。

供讀者於線上搜尋、訂購圖書。也正因為亞馬遜網路書店的書目數量龐大，是以適當的分類尤為重要。在其網站上，可以看到諸多圖書類別，而讀者透過網頁的瀏覽，即可得知自己感興趣的圖書類型中有何新書或值得一讀的好書。基於亞馬遜網路書店的代表性，故本研究特別列出其傳記圖書的分類方式以為參考。

表 2.4 亞馬遜書店「傳記與回憶錄」之細類

	類別 (中文)	類別 (英文)
1	一般類	General
2	藝術與文學	Arts & Literature
3	有聲書	Audiobooks
4	種族與國家	Ethnic & National
5	家庭與童年	Family & Childhood
6	歷史的	Historical
7	大字版	Large Print
8	領袖與名人	Leaders & Notable People
9	人物 A to Z	People, A-Z
10	專業與學術	Professionals & Academics
11	參考與整理	Reference & Collections
12	加拿大地區	Regional Canada
13	美國地區	Regional U.S.
14	特殊團體	Specific Groups
15	運動與戶外	Sports & Outdoors
16	旅遊	Travel

(資料來源：www.amazon.com)

亞馬遜網路書店的圖書類別中包含有「傳記與回憶錄」(Biographies & Memoirs) 一類，之下再劃分為十六小類：1.一般類 (General)，2.藝術與文學 (Arts & Literature)，3.有聲書 (Audiobooks)，4.種族與國家 (Ethnic & National)，5.家庭與童年 (Family & Childhood)，6.歷史的 (Historical)，7.大字版 (Large

Print), 8.領袖與名人 (Leaders & Notable People), 9.人物 A to Z (People,A-Z), 10.專業與學術 (Professionals & Academics), 11.參考與整理(Reference & Collections), 12.加拿大地區(Regional Canada), 13.美國地區 (Regional U.S.), 14.特殊團體 (Specific Groups), 15.運動與戶外 (Sports & Outdoors), 16.旅遊 (Travel)。茲整理如表 2.4 所示。

亞馬遜網路書店「傳記與回憶錄」一類下所包含之細類，並非全然以人物為主、亦非以傳記之體裁或寫傳者作為分類標準，似難察知其分類的原則。大體而言，如此分類之著眼點，應是考慮到便於讀者以常識判斷搜尋圖書。

此外，黃明賞《從新聞寫作到傳記寫作——記者角色的一個時代性觀察》中，以其觀點將台灣的政治人物傳記依內容分為六類：1.政治團隊，如《綠扁帽執政團》；2.恩怨情仇，如《李登輝的一千天》；3.選戰策略，如《逐鹿首都》；4.政績評論，如《陳水扁武功心法》；5.從政經歷，如《陳定南前傳》；6.成長史，如《少年馬英九》。黃明賞僅針對台灣的政治人物傳記進行概略分類，雖與本研究之立意不同，但亦可作為了解政治人物傳記圖書發展之參考依據。

Oates (1986) 則以「寫作者在傳記中所處之位置」將傳記圖書分為三類：1.評論式的傳記 (critical biography)。寫作者透過對傳主的描寫，來立證自己的觀點。2.學院編年史 (scholarly chronicle)。寫作者在傳記中的位置是抽離的。3.純粹的傳記 (pure biography)。寫作者在傳記中扮演的角色是隱匿的，他將表演舞台留給傳主，只提供了必要的歷史背景資料。

2.2.5 小結

在本節中，筆者乃依據所蒐集之文獻，說明傳記圖書的各種分類方式及其特點。大體而言，「圖書館的分類方式」在對於知識的分類和利用上有其優點，但較不符合本研究之立意；「以傳記的體裁或寫傳者作為分類標準」的分類方式，較常使用於文史領域中對於文本的分析探討；「以傳記人物作為分類標準」的特色，乃是便於使人一望即知該傳記圖書的內容。不論如何，了解這些各有立基點的不同分類方式，可讓筆者對於傳記圖書的內涵有更完整的了解。

適當的分類，方能凸顯各類型的意義，清楚且有系統地梳理被分類的知識概念或實體事物的實際狀態。在了解各種傳記圖書分類方式的特色後，筆者乃擇取一適合本研究立意之分類方式，作為本研究觀察傳記圖書發展之基礎，以下茲略作說明。

謝寶煖（1994，頁 61）表示：「夫世界者，人之積也。」梁啟超（1976）亦道：「正史就是以人為主的歷史。若把幾千年來，中國歷史上活動力最強的人抽去，歷史到底還是這樣與否，恐怕要生問題了。」⁵杜維運（1984，頁 39）則認為：「人在歷史之中，其所思所行，掀起了歷史的萬變。一旦人離歷史而去了，歷史的變便豁然而中止了。」鄭尊仁（2002，頁 12）則強調傳記文學著重的是人，而非歷史，不是事件以及工作經歷。

綜合以上各家所言，可明確知道「人」在歷史中所占之重要地位；而本研究對於傳記圖書所下的定義乃是：「在寫作形式上非為虛構的

⁵ 引自謝寶煖（1994），傳記資源之利用，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 27 卷，第 2 期，61 頁。

記述人物生平與生活之圖書作品」。是故，本研究在傳記圖書的分類上乃以「人」為重心，選擇以人物的類型作為分類標準。因為，「人」是傳記圖書中最主要的元素、最能彰顯出此本傳記圖書與他本傳記圖書不同的條件。雖然，若採取以傳記的體裁或寫傳者作為分類標準，或者其他的分類方式，對數量龐大的傳記圖書加以觀察分析，亦能從其他的角度檢視傳記圖書的發展脈絡。然而，以筆者一人之心力，恐無法面面俱到地分析之，因此乃希望透過最符合本研究立意之傳記圖書分類方式，在某個層面上對於台灣傳記圖書的發展進行全面的觀照。

根據以上的諸多考量，本研究乃採取以人物作為傳記圖書分類的標準。至於所建構的傳記圖書類型，及建構的依據和過程，將在第三章研究方法中另闢一節詳述之。

2.3 知識社會學

本研究除了希冀探討台灣傳記圖書的類型及其發展外，亦期望思索其背後更深一層的意涵，尤其是傳記圖書與社會間的關係。據此，本研究擬採知識社會學的觀點，以作為詮釋上的基礎。於本節中，乃針對知識社會學的源起、內涵及其相關研究做一探討。

2.3.1 知識社會學的發展

知識社會學一詞，是由德國哲學家謝勒（Max Scheler）於一九二四年所提出的，這門社會學中的分支，亦是於二十世紀初方得到學界的公認。但若欲推究其起源，有論者認為甚至可以上溯至培根（Francis Bacon）的著作（Michael Mulkay，1991，頁5）。Berger & Luckmann

(1991, 頁 12) 則將馬克思思想、尼采哲學以及歷史主義, 視為知識社會學的一道源流。至於知識社會學產生的時代背景, 黃瑞祺 (1982, 頁 214-215) 表示, 其與二十世紀初以來社會結構的日益複雜分化有關。因為社會結構的改變, 致使不同的階層或團體在思想或價值觀上亦產生諸多歧異, 而這些歧異則導致各相異階層或團體對於彼此的觀念與語言有所懷疑。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 一些探討觀念及語言背後之基層因素, 如社會位置、心理衝突、人際關係等的思潮乃紛紛興起, 如馬克斯主義、語意學、功能分析等皆是。而知識社會學, 亦是這波時代思潮中的一個派別。

大體而言, 馬克思對於知識與階級利益間關係的深刻批判, 是早期知識社會學中的重要命題。馬克思認為「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 經濟現實通過各種社會經濟過程最終決定了『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鄧志松, 1998) 亦即, 他所強調的是: 一個時代知識或社會知識的建構, 經濟乃是關鍵性的作用要素。

謝勒是知識社會學領域的發展過程中, 另一個重要的代表人物。他認為知識或思想皆為社會下的產物, 若欲探討其產生和發展, 就應該了解其與社會群體之間的關聯(中國大百科全書·社會學, 1993)。謝勒並提出「實際因素」(Realfaktoren) 的概念, 以擴展馬克思僅針對經濟和階級利益因素決定知識構成的觀點。他表示, 「實際因素在不同的社會和文化體系中, 以各種特定的方式決定人們的思想。」(鄧志松, 1998)

曼海姆 (Karl Mannheim) 可說是知識社會學最重要的奠基者, 其代表性可以由 Berger & Luckmann(1991, 頁 16-17) 的話得到證明:

「至今日，人們一旦論及知識社會學，無論任何意見上的差異，都是以曼海姆的討論風格為依歸。」而曼海姆的一些著作，如《意識形態與烏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 也成為知識社會學中的代表經典。若欲追溯曼海姆的思想傳承，黃瑞祺 (1982 , 頁 230-231) 認為，黑格爾哲學、馬克思主義，與德國文化科學三者最為主要。黑格爾哲學影響了曼海姆對於歷史的詮釋；馬克思主義的諸多概念，例如階級衝突、意識形態等，則成為曼海姆論及知識社會學時的部分基礎；而德國文化科學的傳統，如重視行為背後的動機、意義及價值等，也對曼海姆的思想有所影響。

曼海姆認為，「精確科學」(exact science) 及形式知識 (formal knowledge) 能摒除社會諸多存在因素的影響，而諸如與歷史、政治、社會科學有關的知識或是人們日常的思想，都無法不受社會之制約 (黃瑞祺，1982，頁 220)。然而，他擴大了馬克思與謝勒所提出的觀點，認為不僅是階級地位與經濟利益可以對制約知識的構成發生作用，其他諸多因素亦可，例如世代、職業團體、歷史情境、社會思潮、時代精神、文化心理等 (中國大百科全書·社會學，1993，頁 474)。

2.3.2 知識社會學的內涵

企圖為知識社會學下一個定義，可能很困難，也可能很容易。困難的原因是由於知識社會學的界限並非那麼嚴格，它似乎和別的社會學分支如科學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ce) 藝術社會學(sociology of art) 等有所交錯重疊 (Jary & Jary , 1999 , 頁 647)，因此欲為其界定一個明確非常之定義是有其難處的。然而，事實上，知識社會學的涵義亦可用最簡潔的解釋說明之。

知識社會學，簡而言之即是探討知識和社會間關係的一門社會學的分支。這裡所謂的「知識」一詞，應可廣義地解釋為「文化產物的全部總合」(Merton,1957)⁶，其可涵括一切思想、觀念、信仰、日常知識，或者是定義嚴格的專門知識。更進一步地闡釋知識社會學探討的命題，可以包括「什麼樣的社會和文化因素會影響心靈產物？」、「影響的程度如何？」，「社會和文化影響與心靈產物之間又有什麼關係？」(Michael Mulkey, 1991, 頁 6) 至於所謂的社會和文化因素，可以廣泛地包含階級、社會地位、世代、權力結構、競爭與衝突等社會因素，也包括了價值觀、世界觀、時代精神、民族精神等文化因素。端視研究者的興趣與關注焦點，而可從不同的面向探討之(黃瑞祺, 1982, 頁 212)。

總而言之，儘管對於知識社會學的本質及其範圍上的界定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大體而言，一般均認同知識社會學關注的對象，乃是人類的思想與社會脈絡間的關係(Berger & Luckmann, 1991, 頁 10)。

2.3.3 以知識社會學探討圖書之相關研究

在知識社會學的觀點下，一切的思想觀念或專門知識，都是在種種社會條件下所形成的。因此，圖書這一個思想與知識的重要載體，當然也無法獨立於社會而存在。是故，筆者擬以知識社會學的角度探討台灣傳記圖書之類型及其發展，以俾不僅止於觀察表面的現象，尚能發掘其深層的意涵。

⁶ 引自 Michael Mulkey 著，孫中興校訂，蔡振中譯(1991)，科學與知識社會學，台北：巨流，5 頁。

台灣的博碩士論文中，以知識社會學的觀點關注研究對象與社會間之關係者，數量本來就有限。而選擇以知識社會學的角度深入探討圖書或出版與社會之關聯性的研究則更為稀少。經過搜尋，較為相關的研究包括陳明柔（1992）《日據時代台灣知識分子的思想風格及其文學表現之研究——1920~1937》、鄭世仁（1992）《揭開教科書的面紗》，以及王乾任（2002）《台灣社會學書籍出版史研究：1951-2000年》等。而其中，王乾任的分析架構尤可作為本研究之參考。

王乾任（2002，頁 9-10）認為，從圖書的撰寫者、圖書的內容，以至於圖書生產的技術與行銷方式等，皆與社會有著某種程度的關聯，受到社會其他因素的影響。例如，出版社編輯在選題上不僅評斷文稿的內容，也必須考量其市場接受性，而這些皆與社會條件相關。而在圖書生產上，更可從馬克思生產工具影響生產關係的論點來解析之。是以，他選擇採取知識社會學的角度，由「制度」、「思想」、「人」等三個層面，以深入剖析台灣社會學書籍的出版史。他的分析架構，亦對於本研究有所啟發。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一共有五節。首先，於第一節說明研究程序；第二節與第三節則分別說明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方法，包括文獻研究法（document research）與文獻計量學（bibliometrics）；第四節詳述本研究中傳記圖書書目登錄之資料來源與登錄原則；第五節則闡明本研究所採用的傳記圖書分類方式及類型之選定。

3.1 研究程序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傳記圖書之類型及其發展，並企圖從知識社會學的觀點進一步分析其與社會的關聯性。如第二章文獻探討中「傳記圖書的分類」一節所述，筆者在考量研究目的，並分析數種傳記圖書分類的方式後，選擇以傳記所誌之人物作為分類標準，把戰後到二二年的傳記圖書分為若干類型，再針對這些類型進行分析。

為觀察各個傳記圖書類型的發展，本研究乃以「文獻計量學」的概念作為研究方法之一，即是透過觀察各個類型中「量」的變化，以審視其發展。此外，兼採「文獻研究法」，經由文獻的蒐集，整理五十七年來傳記圖書的書目以便進行分類統計，並且參考相關文獻以作為詮釋分析時的依據。

3.2 文獻研究法

本研究選擇以文獻研究法與文獻計量學的概念以作為進行研究的方法。本節介紹文獻研究法，下一節則針對文獻計量學的特性做一闡釋。

根據《中國大百科全書·社會學》(1993, 頁 420) 的定義, 文獻研究法是「根據一定的目的和課題, 透過蒐集和分析書面或是聲像資料而進行的探討。」《中國大百科全書·社會學》指出它具有下述幾個特點(1993, 頁 420): 一、間接性: 文獻研究法所處理的資料是間接性的次級資料。二、歷史性: 文獻研究法所處理的資料多為反映歷史狀況者。三、無反應性: 文獻研究法所處理的資料乃是無反應性的次級資料, 資料本身不會產生改變。且由於研究對象並非「人」, 研究者較不會因其影響而受到干擾。

所謂的文獻, 指的是「包含我們希望加以研究的現象的任何訊息形式」(袁方主編, 2002, 頁 377), 其來源與種類眾多, 如報紙、圖書、雜誌期刊、政府或一些組織之統計報告、個人書信, 或是圖片、照片、歌曲、電影、電視等皆屬之。

為獲知台灣地區所出版之傳記圖書的明確數量、類型及其發展, 需透過對大量文獻資料的整理分析與解讀。本研究中使用的主要文獻資料包括下列幾類:

- 一、國家圖書館彙編之書目資料, 包括《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彙編》一至七輯、《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等。一九九九年一月出版法廢止前, 台灣地區出版的所有圖書依法皆須送繳國家圖書館; 二 一年一月後, 出版界則依據圖書館法呈繳出版品。因此, 若欲蒐羅較為完整的台灣出版圖書資料, 則須參考國家圖書館彙編之書目。
- 二、與出版相關之期刊報紙文章。如《出版界》《出版情報》《出版流通》、《文訊》、《書香月刊》、《誠品好讀》、《中國時報》開卷版、《聯合報》讀書人版等。

三、學位論文。學位論文以較為嚴謹的態度和研究方法探討問題，是故其內容可作為參考之依據。

3.3 文獻計量學

文獻計量學，又稱書目計量學，它的定義為：「利用數學、統計學和邏輯學的理論和方法，對各類型文獻的本質和結構作數量、品質和運用上的研究與分析。」(何光國，1994，頁 8)《中國大百科全書·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1993，頁 479)則指出，文獻計量學最主要的特點，在於其輸出的必然是「量」。至於文獻計量學所計量的對象，則包含了文獻量、作者數與詞彙數。雖然文獻計量學有很大部分是應用於分析期刊文章的數量上，但是論文、圖書出版品或其他範圍的文獻，亦可使用文獻計量學的概念以進行分析探討。

文獻計量學的發展，始於二十世紀初。一九一七年，柯勒 (F. J. Cole) 和伊勒斯 (N. B. Eales) 發表了一篇論文，以一五四三到一八六六年之間歐洲各國動物解剖學領域裡的論文作為統計對象，探討不同國家之間的文獻分布狀況及研究興趣的變遷。一九二三年，胡美 (E. W. Hulme) 的研究，將《International Catalogue of Scientific Literature》中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三年間記載之全部期刊，按主題別與不同之國家地區進行分類統計，並提出「文獻統計學」(statistical bibliography)一詞。一九六九年，普理查德 (Alan Pritchard) 提出文獻計量學一詞以取代文獻統計學，並將其研究範疇由期刊擴大至所有的書刊資料。文獻計量學也由是奠基，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許文華，2002，頁 8-9;《中國大百科全書·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1993，頁 479)。

經過多年的發展，目前文獻計量學可說是圖書館學和資訊科學中

最富理論基礎的學科，亦是一種研究時可以使用的方法，其應用不僅止於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也可跨足其他領域(許文華，2002，頁 8)。本研究即是希冀採用文獻計量學的概念，透過對各類型傳記圖書數量的分析，以觀察其發展狀況。雖然文獻計量學中所歸納之關於文獻成長的特定統計規律，如布萊德福律、洛特卡倒平方律等等，並不適用於本研究，但是其核心概念仍可作為本研究之依據。

懷特 (H. D. White) 等人即指出，「文獻計量學在不同規模與層次上具有清晰描繪文獻結構的功能，並且可以描述知識發展趨向。」(許文華，2002，頁 9) 基於此可知，它與本研究之立意是極為貼近的。

3.4 書目登錄之資料來源與登錄原則

本研究首先經由文獻的蒐集，逐一登錄戰後到二〇二二年台灣營利性出版單位所出版之傳記圖書書目，再選擇適當的分類方式以進行圖書分類，得出各類型傳記圖書歷時性的發展。這整個研究過程，即是採用了文獻研究法與文獻計量學的核心概念。本節中，主要說明書目登錄之資料來源與登錄原則。

3.4.1 書目登錄之資料來源

本論文之研究對象為戰後，即一九四五至二〇二二年，台灣營利出版單位所出版的傳記圖書。然而，由於國內對於出版圖書的統計資料並不完整，各統計單位的分類方式亦不一致，較早期的圖書資料因年代久遠更是難以蒐集，因此本研究中所登錄的傳記圖書，主要是依據國家圖書館（原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蒐集整理之圖書書目。國家圖

書館擔負蒐集、保存國家各種文獻之職能，是故，以其作為書目登錄的資料來源較為適當，亦能蒐羅到較為完整的圖書書目。

截至二〇〇二年為止，國家圖書館一共出版了七輯《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彙編》，收錄台灣地區依出版法¹送繳之各類圖書。各輯所涵蓋的時期如下：第一輯：一九六三年年底前。第二輯：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八年六月底。第三輯：一九六八年七月至一九七四年。第四輯：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九年。第五輯：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三年。第六輯：一九八四至一九八八年。第七輯：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三年。本研究中一九四五至一九九三年傳記圖書書目的資料來源，即為《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彙編》第一至第七輯所收錄者。

至於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九年的傳記圖書書目，則是依據國家圖書館出版之該年度的《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逐一登錄之。二〇〇〇年之後的各年度，由於其出版圖書目錄尚未有之，因此，二〇〇〇至二〇〇二年的傳記圖書書目，乃依據國家圖書館每月出刊的《全國新書資訊月刊》，以蒐羅每月出版之傳記圖書書目。

本研究所登錄之傳記圖書書目資料來源，茲整理如表 3.1 所示。

表 3.1 本研究傳記圖書書目登錄之資料來源

年代	書目資料來源
戰後 一九六三年年底	《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彙編》第一輯
一九六四 一九六八年六月底	《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彙編》第二輯
一九六八年七月 一九七四年	《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彙編》第三輯
一九七五 一九七九年	《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彙編》第四輯

¹ 出版法已於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日廢止。二〇〇一年一月十七日「圖書館法」公布後，各出版單位乃依此法送繳圖書至國家圖書館。

一九八	一九八三年	《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彙編》第五輯
一九八四	一九八八年	《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彙編》第六輯
一九八九	一九九三年	《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彙編》第七輯
一九九四	一九九九年	該年度的《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
二	二 二年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由國家圖書館所彙編整理之出版圖書資料皆使用「中國圖書分類法」。中國圖書分類法將中文圖書分為十大類，傳記歸屬於史地類之下，分類號為 780 至 789。780 為傳記，781 為世界名人合傳，782 為中國人傳記，783 為亞洲名人傳記，784 為歐洲名人傳記，785 為美國名人傳記，786 為非洲名人傳記，787 至 789 為各種名人合傳。在此分類號之下的圖書書目，筆者均須登錄之，至於不登錄之例外情形，在下一小節中將詳做說明。

3.4.2 書目登錄之原則

依據研究目的、研究範圍與對象，筆者在進行書目登錄時的原則茲說明如下：

依年代，逐一登錄《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彙編》各輯、《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中「傳記」一類下的書目。如 1.3.2「研究範圍」所述，先摒除非營利性出版單位出版之傳記圖書，如國防部總政治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史館，大學院校出版之學術著作，民間非營利單位等出版之傳記圖書、族譜、非賣品，及為紀念亡故之人而編輯之紀念集。此外，「索引」、「姓名錄」、「姓氏考」等工具性書籍如《中國人名大辭典》等，因為較不符合本研究之立意，因此也不收錄。另因童書性質較為不同，乃不加以

登錄。個人出版者所出版之傳記圖書亦不登錄。非台灣營利性出版單位所出版，而是港澳地區出版社寄贈之圖書，也不在書目登錄的範圍中。

另外，出版年代與出版者不詳的傳記圖書也不做登錄，唯其數量較少，當不致對研究有太大之影響。且為忠實反映書市狀況，再版的傳記圖書也予登錄。同一本書，不同年度由不同出版社出版發行者，亦加以登錄。

在經過蒐集傳記圖書書目，且依年代逐一登錄後，得出符合本研究範圍之傳記圖書，自一九四五至二〇一二年，計有六一七部。下一節，將說明本研究採用之傳記圖書分類方式及選定之類型，再將此六一七部傳記圖書予以分類。

3.5 傳記圖書類型的建構

在第二章文獻探討裡，筆者整理了數種不同的傳記圖書分類方式，在分析其特色、考量本研究之立意後，乃選擇採用「以傳記人物作為分類標準」的方式建構本研究的傳記圖書類型。於本節中，將進一步說明建構類型之過程，並詳列亟欲探討的傳記圖書類型。

本研究首先參考 2.2.3「以傳記人物作為分類標準」所列之分類法。在該節中，筆者列出了三個不同的分類方式，包括：朱文雄(1978)在《當代人物傳記與現代青年》一文中提出之分類、張永政(1996)的論文《讀者閱讀政治人物傳記式書籍之印象研究——以《李登輝的一千天》為例》中所採用之分類，以及博客來網路書店對於人物傳記圖書的分類。其分類方式茲整理如表 3.2。

表 3.2 以傳記人物作為分類標準之分類方式一覽表

	朱文雄的分類	張永政的分類	博客來網路書店的分類
1	政治、外交家	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
2	工業、商業家	企業家	企業人列傳
3	音樂、戲劇家	藝術家	藝術家
4	科學家	科學家	科學家
5	文藝作家、詩人	文史學家	文學家
6	文化、教育、圖書館工作者	宗教與思想家	思想哲學家
7		其他	其他
8		演藝人員	影視人物
9		運動	運動家
10		皇帝	軍事人物
11		妃女	理財大師列傳
12		合輯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比較朱文雄、張永政與博客來網路書店對於傳記圖書的分類，可發現此三種分類方式中，有五種被提出的類型是完全相同或極為相似的，包括：1.政治、外交家 / 政治人物 / 政治人物；2.工業、商業家 / 企業家 / 企業人列傳；3.音樂、戲劇家 / 藝術家 / 藝術家；4.科學家 / 科學家 / 科學家；5.文藝作家、詩人 / 文史學家 / 文學家。而比較其相異處則可發現，張永政與博客來網路書店皆獨立為單一類型的運動家傳記和演藝人員 / 影視人物傳記，在朱文雄的分類中則並未有之。筆者判斷，此乃是因為朱文雄《當代人物傳記與現代青年》一文發表於一九七八年，其時，運動人物傳記與演藝人員 / 影視人物傳記的出版風氣並未盛行，數量較少，且社會上對於此兩種人物亦可入傳的觀念可能尚未普遍形成。而張永政與博客來網路書店的分類都是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以後所提出的，立足點有所不同，在分類上自亦有所差異。關於這一點，即可看出傳記圖書在不同時代上所顯現的某種差

別性。

至於張永政和博客來網路書店對於傳記圖書的分類方式，相同與相似度極高，計有九種類型是相同或相似的，包括了：1.政治人物 / 政治人物；2.企業家 / 企業人列傳；3.藝術家 / 藝術家；4.科學家 / 科學家；5.演藝人員 / 影視人物；6.運動 / 運動家；7.其他 / 其他；8.文史學家 / 文學家；9.宗教與思想家 / 思想哲學家。有兩個類型是相異的，即張永政所提出之皇帝、妃女兩類，及博客來網路書店所提出之軍事人物、理財大師列傳。

交相比較這三種以人物作為分類標準的分類方式，其中相同或相似的傳記人物類型，顯然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意義、在傳記圖書的數量上也比較多的類型。筆者在建立本研究之傳記圖書分類上，自當不宜忽略。至於相異的類型是否該納入，或者，是否尚有其他值得提出的傳記人物類型，筆者乃根據書目登錄過程中對於傳記圖書書目的大量瀏覽，以及對傳記類型有了基本的概念並嘗試粗略分類後，再做一判斷，逕行調整。

經參考上述三種以人物作為分類標準的分類方式和其所提出之類型，並加以適度調整後，筆者選擇將「軍事人物」與「政治人物」合併，將「理財大師列傳」與「企業家」歸為一類。如此的調整，乃是因為這些類別性質相似、關聯性高，故併為一類，此可避免分類時模稜兩可之狀況。

是以，本研究乃以傳記圖書所誌之傳記人物作為分類標準，將台灣自戰後以來所出版之傳記圖書劃分為十三個類型：1.「政治軍事界

人物」；2.「商業理財界人物」；3.「文學歷史界人物」；4.「思想界人物」；5.「藝術界人物」；6.「科學界人物」；7.「學術教育界人物」；8.「大眾傳播界人物」；9.「演藝界人物」；10.「體育界人物」；11.「特殊女性」；12.「其他人物」，及 13.「合集」。以下，茲分別說明各傳記圖書類型之界定：

- 一、「政治軍事界人物」：古今中外與政治軍事相關之人物，包括中外皇室人物、及擔任黨政軍要職者，如陳水扁、麥克阿瑟。
- 二、「商業理財界人物」：古今中外與商業及理財相關之人物，包括企業家、金融家等，如亨利福特、張忠謀。
- 三、「文學歷史界人物」：古今中外以文學創作或文學研究而為人所知者，如李白、莎士比亞；或是由於史學上的成就及貢獻而知名者，如司馬遷、黃仁宇。
- 四、「思想界人物」：古今中外的哲學家或思想家，如孔子、蘇格拉底。
- 五、「藝術界人物」：古今中外之藝術家，或與藝術相關之人物，如張大千、梵谷。
- 六、「科學界人物」：古今中外之科學家，如沈括、愛迪生。
- 七、「學術教育界人物」：在學術上卓然有成，或對教育界有卓著貢獻者，如蔡元培。
- 八、「大眾傳播界人物」：從事新聞傳播工作者，如張雅琴。
- 九、「演藝界人物」：此類型乃專指現代中外以電視、電影、流行音樂等流行文化的演出表現而為大眾所知者，如李小龍、伊麗莎白泰勒。

十、「體育界人物」：中外之運動員，或與運動相關之人物，如王貞治、麥可喬登。

十一、「特殊女性」：無法歸類為以上十類之女性人物，而以其女性身分特別被提出而立傳者，如陳圓圓。

十二、「其他人物」：無法歸類為以上十一類之其他人物，如史懷哲。

十三、「合集」：一部傳記所記之人物不只一位，且其性質互異者。

說明本研究所採用之分類標準，和欲觀察的傳記圖書類型後，為避免一些概念上的混淆，茲針對本研究分類上的原則再做一詳述。本研究在分類上，主要是以傳記所誌之人物作為分類標準，而非文本內容。而若筆者明確知道該傳記人物的職業、成就、貢獻者，則直接進行分類；若有疑慮，則參閱文獻或利用網路搜尋人物之生平事蹟，或直接瀏覽文本，再加以判斷分類。在圖書數量的計算單位上，筆者是以「部」為單位，而非「本」或「冊」。因為有些圖書一部並不僅止於一冊，以部為單位，即是以一個選題為單位，在此特加說明。

正如第二章闡述分類概念時所提到的，雖然在專門的學科知識中進行分類時，理應符合嚴格邏輯的要求，但這樣的原則並無法適用於每一學科，在圖書的分類上尤其存在著遵循的困難。而筆者所提出的十三個傳記圖書類型，亦有不盡完善之處。然而，在此一初探性研究裡進行這樣的嘗試，乃是為了對於尚待深入探討的領域做一拋磚引玉之工作。

此外，筆者在針對六一—七部研究範圍內的傳記圖書進行分類

時，亦難避免分類上的主觀性與局限性。因為事實上，有些傳主具備的身分與其主要貢獻並不限於一類，例如民初學者胡適。他文采洋溢、著有大量文史作品，並提倡白話新詩、新文學運動，因此可將之分類為「文學歷史界人物」。然而，他提出的諸多觀念亦對中國近代思想造成深遠的影響，亦可將之歸屬於「思想界人物」。而與胡適有類似情況的傳主，亦不只一二。在針對以此類傳主的傳記圖書進行分類時，筆者很難不以自己個人主觀的認定作為判斷標準，這是一個難以迴避的研究限制。

第四章 台灣傳記圖書的發展

筆者在選定符合本研究立意之傳記圖書分類方式後，即將台灣自戰後，即一九四五至二〇二〇年的六一七部傳記圖書逐一分類，得出各類傳記圖書於各年度的出版數量。依據文獻計量學的觀念，在文獻數量所呈現的變化後必然蘊含著一定程度的意義。是以，觀察分析這些數據，將有助於了解台灣各類型傳記圖書在戰後以降的發展。此外，本研究亦希望透過知識社會學的觀點，進一步探究此數據背後的深層意義。因此，勾勒台灣傳記圖書的面貌，並試圖說明形成此面貌的社會因素，即是本章的主要內容。

本章一共包括三節。第一節為「傳記圖書的整體數據統計」，乃針對本研究整理而得之數據，對於台灣傳記圖書的發展略加分析闡述。第二節為「各類型傳記圖書的演變」，則是觀察本研究所提出的十三個類型，並分析數個傳記圖書主要類型在出版數量與實質內涵上的變化。第三節「社會變遷與傳記圖書的發展」乃立於一制高點，進一步探討社會變遷與傳記圖書發展間的關聯。

4.1 傳記圖書的整體數據統計

雖然在第二章文獻探討中，筆者已根據現有之文獻略加描述台灣傳記圖書的發展概況；但很顯然的，大部分的既有文獻多寫於一九九〇年代以後，所描述的亦多為一九九〇年代之後現象面的觀察。有明確數據作為資料佐證者，僅包括張永政（1996）《讀者閱讀政治人物傳記式書籍之印象研究——以《李登輝的一千天》為例》及黃明賞（1999）《從新聞寫作到傳記寫作——記者角色的一個時代性觀察》，而這兩個研究亦只統計出一九九〇年代的傳記圖書或政治人物

傳記圖書之出版數量，不若本研究進行較長時間、較為完整的整理統計。是故，本節首先列出本研究所得之數據，並據此加以分析，以期對台灣傳記圖書的發展有所了解。

4.1.1 傳記圖書的書市占有率

傳記圖書在台灣類型眾多、逐年增加的圖書出版品中，究竟占有多少的比率？而過去所占之比率，與近年來所占之比率，是否有所差異？有無可能從中觀察出一些特殊的變化？關於這些疑問，都可透過經由比較歷年來傳記圖書與所有圖書的出版數量以得知答案；兩者的統計數量與傳記圖書所占之比率，茲整理如表 4.1。在台灣歷年圖書出版總數的統計部分，一九五二至一九九七年的數據，是來自於辛廣偉（2000）的《台灣出版史》，一九九八至二〇〇二年則是來自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出版年鑑》，至於一九四五至一九五一年，由於年代久遠，並沒有正確的圖書出版數量資料。而在傳記圖書的歷年出版總數部分，則是整理自本研究。

根據筆者的統計，台灣戰後以降由營利出版單位所出版的傳記圖書共計有六一七部；至於歷年來台灣出版的圖書總數，則為 532,709 種。然而，因為文獻的不足，無法確知一九四五至一九五一年，以及二〇〇二年的出版圖書總數。是以，在比較傳記圖書與出版圖書的總數時，暫且排除這些年份所出版的傳記圖書共計二九九部，得到五八八部。這五八八部傳記圖書，則占出版圖書總數的 1.09%。儘管這個計算而得的數據排除了二九九部傳記圖書，但仍具一定程度的參考價值。可知，從戰後迄今，台灣營利出版單位所出版的傳記圖書，約占整體圖書出版品的 1.09%。

表 4.1 台灣歷年來傳記圖書占圖書出版總數之比率

年度	傳記圖書 出版總數	圖書 出版總數	傳記圖書 所占比率 (單位：%)	年度	傳記圖書 出版總數	圖書 出版總數	傳記圖書 所占比率 (單位：%)
1945				1974	69	8799	0.78
1946				1975	108	8921	1.21
1947	1			1976	118	9109	1.30
1948				1977	164	9304	1.76
1949				1978	232	9416	2.46
1950				1979	164	9520	1.72
1951	5			1980	149	8876	1.68
1952	10	427	2.34	1981	186	8865	2.10
1953	16	892	1.79	1982	280	8876	3.15
1954	25	1380	1.81	1983	111	9008	1.23
1955	26	958	2.71	1984	119	9256	1.29
1956	35	2763	1.27	1985	271	8822	3.07
1957	34	1549	2.19	1986	125	10255	1.22
1958	23	1283	1.79	1987	126	12010	1.05
1959	24	1472	1.63	1988	133	11982	1.11
1960	20	1496	1.34	1989	140	12964	1.08
1961	19	761	2.50	1990	132	16156	0.82
1962	32	2404	1.33	1991	284	12418	2.29
1963	25	2601	0.96	1992	161	13501	1.19
1964	48	3095	1.55	1993	189	14743	1.28
1965	45	1104	4.08	1994	233	24481	0.95
1966	51	2199	2.32	1995	268	26073	1.03
1967	86	2252	3.82	1996	261	24859	1.05
1968	48	3950	1.22	1997	182	24554	0.74
1969	95	22556	0.42	1998	164	30868	0.53
1970	92	8714	1.06	1999	101	30871	0.33
1971	122	8504	1.43	2000	84	34533	0.24
1972	63	8216	0.77	2001	247	36546	0.68
1973	68	8547	0.80	2002	290		

(資料來源：1.圖書出版總數方面，1952-1997年：辛廣偉(2000)，台灣出版史，111頁；1998-2001年：《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出版年鑑》2.傳記圖書出版總數方面：本研究自行整理)

再者，為進一步觀察傳記圖書出版的歷時性發展，筆者將戰後至二二二年的五十七年粗略分為一九五〇年代（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代（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九年）、一九七〇年代（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九年）、一九八〇年代（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九年）、一九九〇年代以後（一九九〇至二二二年）等幾個階段，以檢視傳記圖書所占之比率。茲整理如表 4.2。

表 4.2 各年代傳記圖書占圖書出版總數之比率

年代	傳記圖書 出版總數	圖書 出版總數	傳記圖書所占比率 (單位：%)
1950年代 (不含 1951 年)	193	10,724	1.80
1960年代	469	42,418	1.11
1970年代	1,200	89,050	1.35
1980年代	1,640	100,914	1.63
1990年代以後 (不含 2002 年)	2,306	289,603	0.80
合計	5,808	532,709	1.09

(資料來源：1.圖書出版總數方面，1952-1997年：辛廣偉(2000)，
台灣出版史，111頁；1998-2001年：《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出版年鑑》
2.傳記圖書出版總數方面：本研究自行整理)

觀察表 4.2 的結果可以發現，自戰後以來，台灣傳記圖書占所有圖書出版品的比率並沒有太顯著的變化。大體而言，每個時期傳記圖書的出版數大約皆占全部圖書出版品的 1% 左右。比率最高者為一九五〇年代的 1.80%，比率最低者為一九九〇年代以後的 0.80%。由此結果可知諸多文獻中所提到的，一九九〇年代以後傳記圖書彷彿書市新銳之現象，並非表現在書種的數量上。那麼，何以會造成一九九〇年代以降傳記圖書蓬勃發展的一般印象呢？關於此，筆者認為應是由於一九九〇年代以後傳記圖書所記述之人物，多為各領域之知名人物，或是因應時勢潮流之話題人物，加上新書的資訊較過往便於取

得，因此容易使一般大眾產生傳記圖書數量大量增加的印象。例如，經由筆者的觀察，一九九〇年代以後與重要選舉有關之政治人物傳記的數量所占比率其實並不高，卻因其能夠吸引媒體與讀者的注意、締造亮眼的銷售成績，進而造成傳記圖書大量興起的印象。

4.1.2 其他相關分析

對於台灣傳記圖書歷年來在書市中占有的比率有所了解後，為進一步更完整地勾勒出台灣傳記圖書清晰的面貌，筆者希望能針對以下問題求得解答：這六、七部傳記圖書，主要是由哪些出版社所出版的？它們多為本土創作，抑或者是翻譯作品？關於這些問題，筆者乃同樣根據所蒐羅之書目資料以進行相關分析。

表 4.3 本土創作與翻譯之傳記圖書總數及所占比率

	本土創作之 傳記圖書總數	本土創作之 傳記圖書比率	翻譯之 傳記圖書總數	翻譯之 傳記圖書比率
1950 年代以前	137	67.82%	65	32.18%
1960 年代	348	74.20%	121	25.80%
1970 年代	904	75.33%	296	24.67%
1980 年代	1258	76.71%	382	23.29%
1990 年代以後	1965	75.69%	631	24.31%
出版總數	4612	75.52%	1495	24.48%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經過統計，這六、七部傳記圖書中，計有四六一二部為本土創作，一四九五部為翻譯作品，本土創作所占的比率為 75.52%，明顯高於翻譯作品的 24.48%。若依年代為觀察的基準，將戰後及至二

二年同樣粗略劃分為一九五〇年代以前、一九六〇年代、一九七〇年代、一九八〇年代、一九九〇年代以後等階段，比較本土創作與翻譯的傳記圖書之所占比率，可得知在傳記圖書的範疇中，翻譯作品出

版的數量並無逐年增加的趨勢。整體而言，本土創作的傳記圖書在長期以來的比率大約皆占七成左右。關於具體的數據，茲整理如表 4.3。

另外，根據本研究所整理的傳記圖書書目資料，得出歷年來在傳記圖書的出版數量上最多的前十家出版社依序為：臺灣商務印書館、明文書局、傳記文學出版社、時報出版社、名人出版社、廣文書局、正中書局、近代中國出版社、聯經出版社、天下出版社。其出版數量與相關書系茲整理如表 4.4。

表 4.4 傳記圖書出版數最多的出版社

出版社	傳記圖書 出版數(部)	相關書系
臺灣商務印書館	407	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
明文書局	370	明代傳記叢刊；清代傳記叢刊
傳記文學出版社	139	
時報出版社	139	People 系列
名人出版社	130	
廣文書局	97	年譜叢書
正中書局	90	
近代中國出版社	83	先烈先賢傳記叢刊
聯經出版社	80	
天下文化	75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基本上，這十家出版社又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類的出版社，乃是因為大量翻印傳記古籍而累積了龐大的出版數量，如臺灣商務印書館、明文書局、廣文書局。而這些傳記圖書，多集中於一九八〇年代以前出版。第二類出版社所出版的傳記圖書雖不是以翻印古籍為主，有翻譯國外著作者，亦有本土寫作之當代傳記，但其傳記圖書的出版，亦是集中於一九八〇年代以前，如名人出版社、正中書局及近代

中國出版社。第三類出版社在傳記圖書的出版上，則是集中於一九八
 年代以後。不論是翻譯國外的著作，或是本土寫作之當代人物傳記
 皆有之。此類出版社，包括了時報出版社、聯經出版社、天下文化等。

此外，出版社為塑造旗下出版品的整體形象，並鎖定目標讀者市
 場，多以書系規劃的方式將類型或主題相同及相似的圖書納入一個範
 疇中，以便於進行企劃、編輯及行銷。因此，許多出版社皆有傳記相
 關書系之規劃。筆者謹將台灣出版社歷來規劃之傳記圖書相關書系整
 理如附錄一，以作為了解台灣傳記圖書發展的參考。

4.2 各類型傳記圖書的演變

對於台灣傳記圖書的整體數據進行統計整理後，本節將進一步分
 析各類型傳記圖書的發展，這亦是本研究主要的目的之一。經由逐一
 登錄研究範圍中的傳記圖書，再依據本研究建立之分類方式將此六一
 七部傳記圖書分為十三類後，得到自一九四五迄至二〇〇二年各年
 度各類型出版的總數及所占比率，統計整理如表 4.5 所示。

表 4.5 各類型傳記圖書出版總數及所占比率 (單位：部)

類 型 年 代	政治 軍事 界人 物	商業 理財 界人 物	文學 歷史 界人 物	思想 界人 物	藝術 界人 物	科學 界人 物	學術 教育 界人 物	大眾 傳播 界人 物	演藝 界人 物	體育 界人 物	特殊 女性 人物	其他 人物	合集	總數
194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950	1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3
1951	2	0	0	0	0	0	0	1	0	0	0	1	1	5
1952	3	0	2	0	1	2	0	0	0	0	0	0	2	10
1953	7	0	1	0	0	2	0	0	0	0	0	0	6	16
1954	16	0	1	0	1	0	1	0	1	0	0	2	3	25

表 4.5 各類型傳記圖書出版總數及所占比率（續）

類 型 年 代	政治	商業	文學	思想	藝術	科學	學術	大眾	演藝	體育	特殊	其他	合集	總數
	軍事 界人 物	理財 界人 物	歷史 界人 物	界人 物	界人 物	界人 物	教育 界人 物	傳播 界人 物	界人 物	界人 物	女性	人物		
1955	10	0	3	0	2	1	0	0	0	0	1	2	7	26
1956	15	2	5	0	2	3	0	0	0	0	0	5	3	35
1957	11	2	4	5	1	2	0	2	0	0	0	2	5	34
1958	6	0	4	0	2	2	0	0	0	0	0	5	4	23
1959	8	0	2	3	2	0	0	0	0	0	0	3	6	24
1960	6	0	4	1	3	1	1	0	0	0	0	2	2	20
1961	12	0	3	1	1	0	0	0	0	0	0	1	1	19
1962	10	0	4	7	1	1	0	0	0	0	0	2	7	32
1963	10	0	5	2	0	1	0	0	2	0	0	0	5	25
1964	14	0	10	3	2	7	2	0	0	0	0	0	10	48
1965	20	0	6	0	0	2	3	0	1	0	0	3	10	45
1966	15	1	9	1	0	4	0	1	1	0	1	2	16	51
1967	28	1	16	8	8	4	5	0	0	0	1	6	9	86
1968	16	2	6	5	5	1	1	1	0	0	0	7	4	48
1969	28	1	40	5	5	3	1	0	1	2	0	4	5	95
1970	29	1	20	5	1	9	3	0	0	1	0	7	16	92
1971	43	2	39	7	3	4	3	0	0	0	2	3	16	122
1972	24	1	21	1	1	2	1	2	0	0	1	1	8	63
1973	25	9	11	3	2	1	1	1	2	0	2	5	6	68
1974	21	4	23	0	1	0	0	2	1	0	1	6	10	69
1975	27	6	35	2	2	3	1	2	2	0	3	11	14	108
1976	33	3	25	3	0	7	1	4	2	0	3	8	29	118
1977	37	4	50	5	5	10	1	0	7	5	0	18	22	164
1978	72	3	93	16	8	2	3	1	0	0	6	11	17	232
1979	61	3	45	10	2	11	6	0	0	1	1	7	17	164
1980	50	3	50	9	5	2	1	2	0	1	4	14	8	149
1981	66	4	42	10	1	2	4	2	3	5	3	18	26	186

表 4.5 各類型傳記圖書出版總數及所占比率（續）

類 型 年 代	政治	商業	文學	思想	藝術	科學	學術	大眾	演藝	體育	特殊	其他	合集	總數
	軍事 界人 物	理財 界人 物	歷史 界人 物	界人 物	界人 物	界人 物	教育 界人 物	傳播 界人 物	界人 物	界人 物	女性	人物		
1982	64	9	89	9	20	17	6	5	0	3	5	31	22	280
1983	31	3	31	2	1	3	5	1	1	0	2	15	16	111
1984	36	2	29	15	6	1	2	1	2	0	0	6	19	119
1985	65	8	58	13	64	1	0	1	4	0	3	10	44	271
1986	35	10	28	2	5	6	5	1	3	2	2	12	14	125
1987	31	7	30	9	5	6	0	1	8	2	1	15	11	126
1988	52	10	25	10	5	0	3	4	2	1	0	10	11	133
1989	67	5	24	4	6	3	5	3	0	1	1	8	13	140
1990	49	3	18	12	4	5	6	0	2	0	6	7	20	132
1991	108	5	56	6	11	3	1	1	1	0	7	12	73	284
1992	49	10	34	3	4	13	1	1	6	4	2	19	15	161
1993	79	8	35	4	6	5	3	2	4	4	4	12	23	189
1994	90	7	36	5	6	2	7	4	3	9	5	34	25	233
1995	120	4	36	7	2	10	3	4	5	10	6	25	36	268
1996	66	17	72	3	10	10	6	9	12	5	7	32	12	261
1997	41	11	27	3	7	7	6	6	14	14	8	21	17	182
1998	40	15	31	2	1	10	3	1	13	7	4	26	11	164
1999	21	8	30	3	1	2	2	3	7	0	1	15	8	101
2000	18	2	26	5	2	5	2	1	1	0	1	14	7	84
2001	49	26	64	2	17	8	4	3	10	2	8	39	15	247
2002	62	27	64	3	10	8	5	3	13	9	6	59	21	290
合計	1899	249	1422	234	260	215	114	76	134	88	108	578	730	6107
所占 比率 (%)	31.10	4.08	23.28	3.83	4.26	3.52	1.87	1.24	2.19	1.44	1.77	9.46	11.95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觀察表 4.5 的數據，可得知若干具體的結論。在戰後迄今的五十七年來，在筆者提出的十三種傳記圖書類型中，出版總數最多的前三者，依序為「政治軍事界人物」、「文學歷史界人物」，及「合集」。其所占整體傳記圖書之比率，分別為 31.10%、23.28% 及 11.95%。至於出版總數較少的前三種傳記圖書類型，則包括「大眾傳播界人物」、「體育界人物」，及「特殊女性」。其所占整體傳記圖書之比率，分別為 1.24%、1.44%、1.77%。

4.2.1 各類型傳記圖書之分期統計

接下來，本研究亟欲根據表 4.5 對於各類型傳記圖書數量的整理統計，進一步分析各類型傳記圖書歷時性的發展。這個部分，乃是透過各類型傳記圖書於所有傳記圖書中所占之比率來觀察。然而，由於本研究的時間範圍共計有五十七年，若逐年分析恐怕略嫌龐雜，亦難真正察覺其顯著之變化。是故，筆者乃採取兩種時間上的基準點來統計觀察之。首先，大致上以十年作為一個區隔期間，將戰後到二二二年分為一九五〇年代以前、一九六〇年代、一九七〇年代、一九八〇年代，以及一九九〇年代以後。這種劃分方式雖然未盡理想，但作為觀察傳記圖書歷時性發展的參考基準，亦不失為一種清楚明瞭的時間劃分方式。

然而，大致以十年作為一個觀察期間的劃分方式，當然有其不足之處。雖然可以從各階段的不同數據中窺知各類型傳記圖書的某些發展變化，卻亦可能忽略若干脈絡軌跡。是故，本研究酌以另一種時間上的分界作為觀察的參考基準，即是以一九八七年的政治解嚴作為分水嶺，將戰後到二二二年劃分為一九四五至一九八七年、一九八八至二二二年兩個階段，以觀察戒嚴時期與解嚴後各類型傳記圖書的

發展。明確而言，台灣是於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解嚴。而由於出版社在進行選題、編輯等印前作業需要一段時間，是以在統計解嚴後的傳記圖書時，筆者採取以一九八八年作為起始點。

以解嚴此一政治事件作為時間上的分界點，是台灣許多社會學相關研究中常使用的分析基礎。這樣的劃分方式有其根據亦有其缺失，但在本研究中作為觀察傳記圖書類型發展的一種角度應是頗為適切的，以下茲就原因略作說明。

本研究之所以選擇以戒嚴時期與解嚴後兩個階段，作為觀察傳記圖書類型歷時性發展的其中一種角度，乃是因為諸多文獻中對解嚴之於台灣圖書出版或傳記圖書出版的影響，皆特意加以著墨。而筆者在登錄傳記圖書書目的過程中，亦察覺到解嚴前後傳記圖書呈現的發展狀況確實有所不同，因此乃試圖以解嚴為一個分水嶺，透過明確的數據以觀察分析解嚴前後傳記圖書類型發展的實際狀況。

政治解嚴之於台灣傳記圖書出版究竟有何影響？胡衍南（1993，頁 26）認為，政治上的解嚴使得傳記圖書猶如其他文化生產一樣，企圖積極填充讀者長時間以來的思想空白。於此前提下，遂有諸如政治人物、財經人物、影藝名人等各種傳記圖書的出版。鍾芳玲（1995，頁 3）觀察一九九〇年代中期政治人物傳記大量出版的趨勢，表示這可能是因為台灣在解嚴之後，大量釋出政治力及社會力而導致的現象。而辛廣偉（2000）在其著作《台灣出版史》中，則將解嚴作為其劃分歷史年代陳述台灣出版史的時間點之一。他在第五章「解嚴至九〇年代的圖書出版業」中即明確地指出：解嚴，以及該年台灣政府開放民眾至中國大陸探親，及翌年（一九八八年）元旦開放報禁等一連

串伴隨著解嚴而來的措施，使得台灣社會產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個時期不只政治上產生大幅度的轉變，整體經濟也快速發展，而這些現象反映在出版業中，遂促使台灣出版業不論在出版品內容、形式，或是出版者自身的結構和市場等都產生極大的變化。因之，辛廣偉（2000，頁 107）更進一步指出，「政治型態的變革在出版界導致的最直接、最迅速的結果就是出版空間的全面擴展。」此外，他在陳述解嚴後台灣圖書出版業的發展情況時，特別點出「出版內容的多元化」此一特色，並表示與各項選舉有關之競選圖書與傳記歷史是此時的另一個新市場。他認為不僅民眾關注公眾人物的一舉一動，公眾人物亦樂於透過傳記來推銷自己。

基於上述文獻之分析，以及筆者在登錄書目過程中的觀察，本研究在檢視各類型傳記圖書的發展時，除了採用大致上以十年作為一個時期的時間基準外，另選擇以政治解嚴作為分水嶺，分析解嚴前後各類型傳記圖書的發展。據此，筆者首先大致以十年作為一區隔期間，統計各類型傳記圖書的出版總數，茲整理如表 4.6。表 4.7 則列出各類型傳記圖書於各年代所占之比率。

根據表 4.6 與表 4.7 的數據，可清楚地觀察出各類型傳記圖書之個別發展。而因為台灣的圖書與傳記圖書在整體數量上，皆呈現逐年成長的趨勢（如表 4.1 所示），因此若僅止於觀察數量的變化，恐怕較難窺知各類型的發展狀況，因此筆者主要是依據表 4.7 分析各類型傳記圖書所占之比率，以了解其變化。

表 4.6 各年代各類型傳記圖書之出版總數

(單位：部)

類 型 年 代	政治	商業	文學	思想	藝術	科學	學術	大眾	演藝	體育	特殊	其他	合集	總數
	軍事 界人 物	理財 界人 物	歷史 界人 物	界人 物	界人 物	界人 物	教育 界人 物	傳播 界人 物	界人 物	界人 物	女性	人物		
1950年 代以前	79	4	22	8	11	13	1	3	1	0	1	20	39	202
1960 年代	159	5	103	33	25	24	13	2	5	2	2	27	69	469
1970 年代	372	36	362	52	25	49	20	12	14	7	19	77	155	1200
1980 年代	497	61	406	83	118	41	31	21	23	15	21	139	184	1640
1990年 代以後	792	143	529	58	81	88	49	38	91	64	65	315	283	2596
合計	1899	249	1422	234	260	215	114	76	134	88	108	578	730	6107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 4.7 各年代各類型傳記圖書所占比率

(單位：%)

類 型 年 代	政治	商業	文學	思想	藝術	科學	學術	大眾	演藝	體育	特殊	其他	合集
	軍事 界人 物	理財 界人 物	歷史 界人 物	界人 物	界人 物	界人 物	教育 界人 物	傳播 界人 物	界人 物	界人 物	女性	人物	
1950年 代以前	39.11	1.98	10.89	3.96	5.45	6.44	0.50	1.49	0.50	0.00	0.50	9.90	19.31
1960 年代	33.90	1.07	21.96	7.04	5.33	5.12	2.77	0.43	1.07	0.43	0.43	5.76	14.71
1970 年代	31.00	3.00	30.17	4.33	2.08	4.08	1.67	1.00	1.17	0.58	1.58	6.42	12.92
1980 年代	30.30	3.72	24.76	5.06	7.20	2.50	1.89	1.28	1.40	0.91	1.28	8.48	11.22
1990年 代以後	30.51	5.51	20.38	2.23	3.12	3.39	1.89	1.46	3.51	2.47	2.50	12.13	10.90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觀察這十三個傳記圖書類型所占比率的變化，筆者認為可特別提出加以說明的，包括「政治軍事界人物」、「商業理財界人物」、「思想界人物」、「演藝界人物」、「體育界人物」、「其他人物」及「合集」等七種類型，以下茲分述之。

與一般文獻所述之現象略有差異，與大多數人對於傳記圖書的印象亦有所不同，筆者發現「政治軍事界人物」類型在所有傳記圖書中所占之比率，並非呈現出持續成長的狀況。此類型於一九五〇年代以前，所占比率為 39.11%；一九六〇年代，為 33.90%；一九七〇年代，為 31.00%；一九八〇年代，為 30.30%；一九九〇年代以後，為 30.51%。雖然各個時期裡，「政治軍事界人物」類型所占的比率一直居於首位，且高達 30% 以上，然而所占比率最高的時期乃是一九五〇年代以前，並非一般人印象中的一九八〇年代與一九九〇年代以後。而且，其所占比率甚至有下滑之勢。

與「政治軍事界人物」類型一樣呈現明顯負成長者，尚有「合集」一類。「合集」類型的傳記圖書，其所占比率在一九五〇年代以前，為 19.31%；一九六〇年代，為 14.71%；一九七〇年代，為 12.92%；一九八〇年代，為 11.22%；一九九〇年代以後，則為 10.90%。本研究對「合集」類型傳記圖書的定義，乃是指該本傳記所記述之人物不只一位，且其性質分屬筆者所劃分之不同類型。這一類型傳記圖書的所占比率之所以呈現逐年下滑之勢，筆者認為乃是出版社在編輯策略上的不同所致。不過，大體而言，「合集」一類仍是傳記圖書中出版數量甚多的類型之一。

至於「思想界人物」類型所占比率的變化，若以年代觀之，可清楚地發現其從一九五〇年代以前的 3.96% 到一九六〇年代的 7.04%，有極為顯著的增加。其後的一九七〇年代降為 4.33%，一九八〇年代略升至 5.06%，一九九〇年代以後則驟降至 2.23%。

此外，「商業理財界人物」類型的傳記圖書於各年代所占之比率，

則明顯的呈現出正向成長的趨勢：一九五〇年代以前，其占 1.98%；一九六〇年代，占 1.07%；一九七〇年代，占 3.00%；一九八〇年代，占 3.72%；一九九〇年代以後，則占 5.51%。可見，「商業理財界人物」類型的傳記圖書，在一九九〇年代以後有幅度較大的成長。

「演藝界人物」類型的傳記圖書，在一九九〇年代以前所占的比率都不高。一九五〇年代以前，為 0.50%；一九六〇年代，為 1.07%；一九七〇年代，為 1.17%；一九八〇年代，則為 1.40%。但是，到了一九九〇年代以後，其出版的數量明顯增多，所占的比率為 3.51%，有極為顯著的成長。

「體育界人物」類型的傳記圖書，在整體出版數量上雖不及演藝界人物類型，但其所占比率的成長狀況則是相同的。其出版量占傳記圖書的比率從一九五〇年代以前的 0%，到一九六〇年代的 0.43%、一九七〇年代的 0.58%、一九八〇年代的 0.91%，呈現出微幅的成長。但到了一九九〇年代以降，其所占比率則明顯增加為 2.47%。

「其他人物」類型的傳記圖書於各期間所占之比率為：一九五〇年代以前，占 9.90%；一九六〇年代，占 5.76%；一九七〇年代，占 6.42%；一九八〇年代，占 8.48%；一九九〇年代以後，則占 12.13%。基本上，它所占比率的變化並非持續的成長。不過，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一九九〇年代以後其成長的幅度是較為明顯的，所占之比率相較其他時期亦為最高者。所謂的「其他人物」類型，即是無法歸納於任一類型的傳記人物，其包含宗教界人物、醫護界人物、農業界人物等。因此，除了得知其所占比率的變化，亦須了解不同時期，於其他人物類型中的主要傳記人物究竟以何者居多，如此方能確切了解此類

型的發展。關於這個部分，將在 4.2.2 中加以說明。

綜上所述，大致上以十年作為一區隔期間檢視傳記圖書各類型的發展，可以發現：「政治軍事界人物」及「合集」兩類型之所占比率係呈現逐漸下滑的趨勢；而「思想界人物」類型的所占比率，其實並不是太穩定，也無顯著之增減軌跡可循。至於「商業理財界人物」、「演藝界人物」、「體育界人物」、「其他人物」等類型，其所占比率皆於一九九〇年代以後有幅度較大之顯著成長。

除了以上的觀察角度外，本研究尚另以一九八七年的政治解嚴為一分界，將戰後至二〇〇二年劃分為解嚴前與解嚴後兩個時期，整理統計各類型傳記圖書的出版數量及所占比率，試圖以另一種角度觀察之。但必須說明的是，戒嚴時期乃始於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然而為了統計之便，亦因為一九四九年前所出版的傳記圖書僅有一本，是故亦將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包含在解嚴前的時期。各傳記圖書類型於解嚴前後的出版總數與所占比率，茲整理如表 4.8、表 4.9。

根據表 4.9 的數據，可明顯觀察出解嚴前後各類型傳記圖書所占比率之增減。呈現顯著正向成長的，包括「商業理財界人物」（從 2.81% 成長至 5.51%）、「演藝界人物」（從 1.27% 成長至 3.24%）、「體育界人物」（從 0.68% 成長至 2.30%）、「其他人物」（從 7.57% 成長至 11.61%）等幾個類型的傳記圖書，而這個發現也和以年代為觀察基準所得之結果相符。可見，這幾種類型的傳記圖書在發展上確實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至於所占比率呈現顯著下滑者，為「思想界人物」（從 5.00% 下降至 2.51%）、「藝術界人物」（從 5.19% 下降至 3.21%）、「合集」（從 13.06% 下降至 10.70%）等類型的傳記圖書。這個發現，亦

與以年代作為觀察基礎所呈現之結果相同。較值得注意的是，「政治軍事界人物」類型的傳記圖書，在解嚴前後所占之比率並沒有太大的變化，不過，解嚴後的比率 31.75%略高於解嚴前的 30.51%。

表 4.8 解嚴前後各類型傳記圖書之出版總數 (單位：部)

類 型 年 代	政治	商業	文學	思想	藝術	科學	學術	大眾	演藝	體育	特殊	其他	合集	總數
	軍事 界人 物	理財 界人 物	歷史 界人 物	界人 物	界人 物	界人 物	教育 界人 物	傳播 界人 物	界人 物	界人 物	女性	人物		
解嚴前	988	91	844	162	168	124	57	31	41	22	42	245	423	3238
解嚴後	911	158	578	72	92	91	57	45	93	66	66	333	307	2869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 4.9 解嚴前後各類型傳記圖書所占比率 (單位：%)

類 型 年 代	政治	商業	文學	思想	藝術	科學	學術	大眾	演藝	體育	特殊	其他	合集
	軍事 界人 物	理財 界人 物	歷史 界人 物	界人 物	界人 物	界人 物	教育 界人 物	傳播 界人 物	界人 物	界人 物	女性	人物	
解嚴前	30.51	2.81	26.07	5.00	5.19	3.83	1.76	0.96	1.27	0.68	1.30	7.57	13.06
解嚴後	31.75	5.51	20.15	2.51	3.21	3.17	1.99	1.57	3.24	2.30	2.30	11.61	10.70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總結以上的數據分析可得知，不論從大致上以十年作為一個時期的角度檢視各年代各類型的傳記圖書，抑或是以解嚴為分界點，觀察解嚴前後傳記圖書各類型的發展，都可得到相似的結果。很顯然的，「政治軍事界人物」一直是台灣傳記圖書中最为主要的類型，不論哪個年代、不論解嚴前後皆然，其所占比率大約為傳記圖書中的三分之一。而「商業理財界人物」、「演藝界人物」、「體育界人物」、「其他人物」等類型，則約於一九九〇年代後呈現出明顯的成長趨勢。此外，「思想界人物」、「藝術界人物」及「合集」等類型所占之比率，則是在一九九〇年代後呈現下滑的現象。

此外，筆者發現，雖然「政治軍事界人物」、「文學歷史界人物」、「合集」、「其他人物」等幾個類型的傳記圖書之所占比率在各個年代，或解嚴前後皆為最高者。但是，各類型傳記圖書所占比率之分布，卻隨著時間的變化呈現出一種由集中到分散的趨勢。是以，筆者乃針對兩種在劃分時間上不同的觀察角度，分別就出版數量最多及最少的三種傳記圖書類型之所占比率進行比較，以期探知明確的變化。茲整理如下頁的表 4.10、表 4.11。

表 4.10 各年代出版數量最多與最少的三種傳記圖書類型總數與所占比率

	出版量最多的前三種類型		出版量最少的前三種類型	
	數量(部)	所占比率	數量(部)	所占比率
1950 年代以前	140	69.31%	2	0.99%
1960 年代	331	70.58%	6	1.28%
1970 年代	889	74.08%	33	2.75%
1980 年代	1087	66.28%	57	3.48%
1990 年代以後	1636	63.02%	145	5.59%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 4.11 解嚴前後出版數量最多與最少的三種傳記圖書類型總數與所占比率

	出版量最多的前三種類型		出版量最少的前三種類型	
	數量(部)	所占比率	數量(部)	所占比率
解嚴前	2255	69.64%	94	2.90%
解嚴後	1822	63.51%	177	6.17%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根據表 4.10 與表 4.11 的數據，可從另一角度來描繪台灣傳記圖書類型的發展狀況。不論從各個年代的角度觀察，抑或是檢視解嚴前後的發展，都可以發現：出版數量最多的前三種類型之所占比率，有逐漸下降之趨勢；而出版數量最少的前三種類型之所占比率，卻有逐漸成長之勢。這樣的現象反映出一個明確的事實：傳記圖書各類型的

數量分布，乃是從早期較集中於某幾個類型，發展至近期分散於多種類型的狀況。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

4.2.2 改變中的傳記圖書類型

在上一小節中，筆者主要是根據各類型傳記圖書的出版數量與所占比率進行解讀，以說明其發展狀況。然而，僅觀察數據並無法全盤了解各類型傳記圖書在實質內涵上的變化。舉例言之，「政治軍事界人物」類型的傳記圖書，雖然從戰後迄今都是出版數量最多、最為主要的傳記圖書類型。但是，隨著時代的演變，主要被書寫立傳的「政治軍事界人物」，是否亦有所改變？同樣地，其他各類型中除了出版數量以外所呈現的發展狀況或許也有值得探討的變化。因此，除了觀察分析各類型傳記圖書的出版數量外，若能再進一步探究其中內涵，當能對台灣傳記圖書類型的發展有更全面且深入的了解。

這個部分的陳述，主要是根據筆者在登錄符合研究範圍的六一七部傳記圖書，且進行分類的過程中，對於各類型傳記圖書的發展有所察覺，並參考相關文獻而進行的分析詮釋。根據觀察，在實質內涵的變化上較值得注意的傳記圖書類型包括：「政治軍事界人物」、「商業理財界人物」、「演藝界人物」、「體育界人物」及「其他人物」等五種類型。至於其他各類型雖然在所占比率上有所增減，但其實質內涵上其實並無明顯之改變。例如，「思想界人物」類型的所占比率歷年來雖然不是太穩定，但各年代此類型傳記所誌之人物在性質上並無顯著差異。是以，筆者乃將焦點鎖定在實質內涵變化上較為顯著的上述幾個類型，以下茲分述之。

如前所述，「政治軍事界人物」在台灣的傳記圖書中是不可忽略

的一個主要類型。戰後以來，其出版總數占所有傳記圖書中的31.10%，是各類型中比率最高者。而根據筆者的觀察，中國古代的政治軍事界人物，以及世界知名的政治軍事界人物，可說是此類型中較為固定的典型人物。亦即，不論是一九五〇年代，或者是二十一世紀的現在，這兩種範圍內的政治軍事界人物，都時有其相關傳記出版。例如岳飛、鄭成功、曹操、林肯、拿破崙、甘地等皆是代表人物。然而，除了一些不隨時代改變而消失之政治軍事界人物傳記外，亦有明顯隨著時代背景不同而衰退或興盛者。為便於觀察及敘述說明之故，茲以年代為觀察基礎，可發現一九五〇年代以前、一九六〇、一九七〇、一九八〇年代皆有不少革命烈士、或參與抗日剿匪之政治軍事界人物的傳記圖書，例如：許克祥（1956）《馬日劉共回憶錄》、沈剛伯等編（1966）《民族英雄及革命先烈傳記》、古僧編（1976）《戴笠將軍與抗日戰爭》、姚曉天（1982）《上海的守護神：謝晉元傳》等。而在一九九〇年代以後，與此相關之政治軍事界人物的傳記圖書就變得極少，取而代之的是與台灣重要選舉有關的候選人傳記，以及當代政治明星的傳記。黃明賞（1999，頁14）亦認為，一九九二年是「台灣本島政治菁英傳記發軔主要的時間分期」。

此外，筆者發現，以中國大陸政治軍事界人物為傳主的傳記圖書，在一九九〇年之後或說是解嚴以降，確實呈現出異軍突起的狀況。此現象應是與政治上的開放有著至為密切的關係。根據筆者的整理，戰後至二〇〇二年，台灣所出版的中國大陸政治軍事界人物的傳記共有八十四本，其中除了兩本以毛澤東為對象的傳記是出版於一九八八年以前，其他皆出版於一九八八年之後，相關整理請參考附錄二。而在諸多的中國大陸政治軍事界人物中，毛澤東與周恩來的傳記圖書，其數量則是比較多的。以毛澤東為傳主的傳記圖書計有三十

本，以周恩來為傳主的傳記圖書則有十六本。

「商業理財界人物」類型的傳記圖書，正如 4.2.1 中所分析的結果，其出版數量與日俱增，所占比率不斷成長，尤其在一九九〇年代以降或解嚴後，成長的幅度更為明顯。探究其因，應該與社會的價值觀改變有所關聯，也與台灣經濟的發展有相關性。觀察此類型傳記圖書的內容，筆者發現，一些世界知名的企業家，如亨利福特、艾科卡、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等人的傳記圖書，是歷年來出版數量較多、並且不隨時代變遷而消失的傳記圖書。而此類型中較值得注意的現象，應是近年來本土企業家及自行創業者傳記的興起，其數量雖有限，但多能引起矚目，或在書市中創造佳績，如溫曼英(1993)《吳舜文傳》、張榮發(1997)《張榮發回憶錄：長榮集團總裁與海結緣的一生》、張忠謀(1998)《張忠謀自傳》、莊素玉(1999)《無私的開創：高清愿傳》及邱維濤(2002)《19歲的總經理》等。

「演藝界人物」類型的傳記圖書，根據 4.2.1 的分析結果可知，其出版數量於一九九〇年之後呈現較為顯著的成長。然而，觀察其內涵，筆者發現演藝界人物類型的傳記圖書在人物分布上極為廣泛多元，歷年來的一百三十四部此類傳記中，傳主包括了國內影視名人、歐美或日本的歌手與影星。不過，不同時代所出版的演藝界人物傳記仍有所差異，而這差異則反映出此類傳記圖書注重話題性，及強調流行性的特點。關於這點，可從以下所列之不同年代的演藝界人物傳記窺之：王柳敏(1973)《白嘉莉的演藝生涯》；Anne Edward(1977)《亂世佳人費雯麗》；陳斐然主編(1981)《林鳳嬌的幕前幕後》；何黛妮譯(1987)《布魯克雪德絲》；成龍與傑夫·楊合著(1998)《我是成龍》；Celion Dion(2001)《我的故事，我的夢——世紀天后席琳

狄翁的成名歷程》。簡言之，檢視不同時代的演藝界人物傳記圖書，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傳記圖書與社會流行文化間關係緊密的特質。

至於「體育界人物」類型的傳記圖書，很明顯的是於一九九〇年代之後方成氣候。根據張永政（1996，頁12-14）所進行的分類統計，運動家傳記在一九九〇至一九九六年間的出版比率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張永政認為，一九九〇年中華職棒開打，具有高知名度的職棒選手如黃平洋、呂明賜等人紛紛出版傳記，是此類型傳記興起的主因之一。而自一九九五年起，亦有國外足球、籃球等明星球員之傳記在台出版，也是造成此類型傳記圖書出版數量增加的原因。李景薇（1994，頁30-31）則表示，職棒運動的興起以及媒體的蓬勃發展，使國人能快速獲知運動比賽的訊息，也促成了此類傳記市場的發展。筆者同意他們的看法，並進一步認為，不論是國內職棒開打、體育頻道如衛視體育台、緯來體育台、年代體育台等的相繼成立，都是所謂的社會條件，而體育界人物傳記圖書的興起，則是因應社會條件和社會價值觀所形成的現象。在此類型中，麥田出版社的「運動家」書系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此書系截至二〇〇二年為止一共出版了五十餘本，其中涵蓋的體育界人物則包括了國內外各種運動領域的知名運動員。

在「其他人物」類型的傳記圖書中，醫界人物史懷哲、著名航海家哥倫布、國內農學界名人沈宗翰，以及雖然聾啞卻能克服生理障礙而有所成就的海倫凱勒等人的傳記圖書，是出版數量較多且數十年來皆陸續不斷出版者。然而，「其他人物」此一類型亦是一種隨著時代而在實質內涵上有所改變的類型。根據筆者的觀察，一九五〇年代以前，在此類型中有為數頗多以華僑作為傳主的傳記圖書，例如李樸生（1958）《我可佩的華僑朋友》、黃定文（1958）《華僑黃氏先賢列傳》

等，這是比較特殊的一個現象。而此類型中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是一九九〇年代以後，不同於以往的傳記圖書大多以各行各業之成功人士為主要記述對象，許多在現實的生理條件、社會條件上處於弱勢者亦能成為傳記的主角，諸如身心障礙者的奮鬥歷程，罹患重症者克服疾病、面對死亡的過程，或小人物之心路歷程等題材的傳記圖書在出版數量上日益增多。以下茲各舉數本傳記圖書為例。

以身心障礙者為記述人物之傳記圖書，例如：羽玄（1992）《自己就是命運的建築師》、蔡文恂（1996）《挑戰人生；不向命運低頭》、朱乃長譯（1997）《聰明的笨蛋：一個閱讀障礙症患者的故事》、乙武洋匡（1999）《五體不滿足》。以罹患重症者為傳主之傳記圖書，例如林建中（1995）《這條路上：國內首位曝光愛滋病毒帶原者林建中親筆自傳》、逸見政孝（1996）《與癌搏鬥記》、莫等卿（1998）《給我換顆心》、宋芳綺（1999）《生命之光：周大觀》、陳宏（2002）《眨眼之間：漸凍人陳宏的熱情人生》。至於以平凡小人物為傳記對象者，賴東進（2000）的《乞丐囡仔》堪稱此中之代表。這部傳記於二〇〇一年五月出版後，迅即成為暢銷書，僅僅半年時間，印量已高達六十六萬冊（徐淑卿，2001）而根據金石堂書店所統計的二〇〇一年 TOP100 暢銷書排行榜中，已出版一年餘的《乞丐囡仔》仍高居第四名，可見其受歡迎的程度。

綜上所述，根據筆者的觀察，在實質內涵上隨著時代改變，發展上亦有較為明顯變化的傳記圖書類型，包括了「政治軍事界人物」、「商業理財界人物」、「演藝界人物」、「體育界人物」，及「其他人物」等類型。它們在質與量上的變化與社會有何關聯，可以用什麼樣的觀點來加以詮釋說明其發展，即是下一節所欲探討的內容。

4.3 社會變遷與傳記圖書的發展

筆者在 4.1 與 4.2 兩節中，已對於台灣傳記圖書及各主要類型自戰後至二二二年在數量和內容上的變化進行詳盡的分析說明，勾勒出傳記圖書發展上的一個具體面貌，而本節將進一步探討其形成原因，亦即探究社會變遷與台灣傳記圖書發展間的關聯。

在知識社會學的觀點下，所有的思想觀念與專門知識，皆與社會存在著密切的關係，皆受種種社會條件的制約影響。採取此觀點，欲探討本研究之對象——傳記圖書及其類型，當然無法忽略其與社會間的關係。基於此，本研究乃企圖循著社會變遷的脈絡以探討台灣傳記圖書歷時性的發展。雖然台灣的社會變遷呈現於諸多面向上，但若欲逐一探討其與傳記圖書發展間之關聯，非但容易使焦點渙散，且實際上，並非任何社會變遷的結果皆與傳記圖書發展有著密切相關。因此，本研究乃根據對於傳記圖書質與量上變化的觀察，提出三個主要面向加以說明，分別為「政治力鬆綁」、「經濟力強化」與「價值多元化」。

4.3.1 政治力鬆綁

在圖書出版的發展中，國家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政治力量的作用，絕對是無法忽略的因素。畢竟，圖書與一般商品不同，向來是人類思想傳播與知識傳承的主要載體。而本研究之對象傳記圖書，又是一種與社會脈動甚為貼近的圖書類型。鄭尊仁（2002，頁 256）也提到：「傳記向來就不是孤芳自賞式的文學精品，它一直擔負著介入社會、改變思想的重責大任。」就是因為傳記圖書具備如此特性，因此，政治力是否對於出版進行干預，對於傳記圖書的發展即能產生重要的影

響。

回顧戰後以降台灣政治力的演變，基本上是呈現由嚴到鬆、由控管到放任的歷程。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從日本手中接管台灣；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台灣進入戒嚴時期；同年十二月國民政府迫遷來台，並與對岸的中國大陸進入政治對立的狀態。此後漫長的數十年間，政治力緊縛著台灣人民及其活動，傳記圖書的出版在此大環境下自亦受到限制。直到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解嚴後，政治力鬆綁，出版活動不再受制於政治干預，傳記圖書的發展方呈現出不同的局面。

解嚴可說是政治力鬆綁最主要的具體事件，而在出版活動上，政治干預力的減弱乃具體呈現在出版政策法規的改變。以下即就解嚴與出版政策法規的改變等要點，說明政治力鬆綁與傳記圖書發展間的關聯。

戰後國民政府為了管制人民的思想言論，對於出版活動有許多政策法規上的限制。在台灣於一九四九年進入戒嚴時期後，戒嚴法第十一條即規定：「戒嚴地區內最高軍事長官，得以禁止集會、結社、遊行、請願並限制言論、講學、新聞、雜誌、攝影、標語暨其他危害軍事的出版物。」隨後，一九五一年頒布的「管制匪報書刊入口辦法」，對於大陸圖書的進口採行管制措施，亦禁止出版大陸作者的作品。此外的相關法規，尚包括一九四九年公布的「台灣省戒嚴地區新聞及雜誌圖書管制辦法」，和一九六八年公布、一九七一年修正的「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等（王乾任，2002，頁45）。這些由政府制定，藉以控制言論、管制出版的相關法規，對於圖書或者傳記圖

書的出版，自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性，因為寫作者與出版社若稍一不慎，即可能被扣上「違反國家」、「挑撥政府與人民情感」等意涵曖昧的罪名（莊麗莉，1994，頁 38）。

周明慧（1998）在探討出版產業型態和其發展狀況，以及政府在出版政策上的不同時，將戰後以降分為三個階段：1.萌芽孕育、管制出版階段：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五年。這個時期，政府針對出版品的進出口與出版進行管制。2.蓬勃起飛、獎助出版階段：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五年。這個時期，政府的態度轉為獎勵出版，並推動相關活動。3.邁向國際、開放出版階段：一九八六年迄今。這個時期，政府已不再對出版進行過多的干預。王乾任（2002）在論及出版政策對於出版及對於社會學圖書的影響時，也將台灣的出版政策分成三大時期：1.孕育管制期：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五年。2.開放管制獎助起飛期：一九七六至一九八六年。3.出版多元、自由期：一九八七年迄今。他在時間上的分期雖與周明慧略有不同，但各期的內涵一致，應是參考自周明慧的研究。周明慧與王乾任兩人以出版政策作為劃分台灣出版史各階段的依據，可見政府的出版政策對於圖書出版的影響甚為深遠。王乾任（2002，頁 48）即提到，一九八〇年代為日後台灣出版的蓬勃發展埋下種子的主因之一，即是一九八七年因解嚴而廢除「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使出版品的控管得以回歸出版法，而警備總部亦退出文化檢查的工作。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台灣解嚴，使得束縛社會已久的政治力鬆綁，一些不合時宜的出版政策法規乃被廢除、走入歷史；傳記圖書在發展上也因此擁有更為自由的空間。廖梅馨（1999，頁 64）認為，戒嚴時期國家政策強烈干預出版活動，使圖書出版缺乏自由發揮的空

間；而解嚴後，戒嚴法廢除，政治壓力驟降，反映在圖書出版上，即是政治人物傳記、內幕秘辛及具有批判性的圖書之出版風潮。

根據本研究對於傳記圖書各類型在數量與內容上的觀察，也可發現政治力鬆綁對於傳記圖書發展的具體影響。如 4.2 中所述，以中國大陸政治軍事界人物為傳主的傳記圖書除了兩本出版於解嚴前，其餘的八十二本皆出版於解嚴後的此種現象¹，即是政治力鬆綁反映在傳記圖書出版上的一個例證。此外，在戒嚴時期，以國家元首如蔣中正、蔣經國為傳主的傳記圖書數量鮮少；而解嚴後，以國家元首如李登輝、陳水扁為傳主的傳記圖書，數量則明顯較多。筆者認為，這樣的現象主要是因為在政治屬於高度敏感話題的時代，不論是寫傳者或出版者，都不願貿然觸碰與國家元首生平事蹟有關的題材，深恐動輒得咎，因此相關的傳記出版得並不多，傳主於書中所呈現的形象亦都是正面的。但在解嚴後，政治力鬆綁，昔日國家元首的功過與秘生活已不再是禁忌的題材，因此也才方有周玉蔻（1990）《蔣經國與章亞若》、羅時敘《蔣介石宋美齡夏都悲歌》等傳記圖書的出版。

而一九九〇年代後興起的選舉候選人之傳記圖書，當然也和政治鬆綁有著直接密切的關係。若非解嚴後陸續開放重大選舉，此類題材的傳記圖書亦無由興起。加上隨著媒體開放、民眾取得資訊較以往容易，各重要選舉的候選人大量曝光，擁有極高的知名度。對於社會大眾而言，能一窺這些政治人物的成長過程、內心世界或得知政治內幕，是極具吸引力的；對於出版社而言，在商業利益的考量下，這些政治人物確實具有相當的賣點，值得為其出版傳記圖書；對於政治人

¹ 請參考附錄二。

物而言，能夠透過另一種形式宣傳自己，何樂而不為？在此種種條件下，乃使得此類傳記圖書興起。

綜上所述，很顯然的，政治力鬆綁對於「政治軍事界人物」類型傳記圖書的發展影響最鉅。至於其他各類型的傳記圖書是否因政治力鬆綁，而在出版數量與實質內容上也受到影響？筆者認為，答案應是肯定的，只是其他類型所受的影響不及「政治軍事界人物」類型。林芳玫（1994，頁 168）認為：「當政府抽身離開文化的領域，讓出來的空間往往是被商業及市場的力量所填補。」廖梅馨（1999，頁 83）亦表示，當圖書出版產業不再受政府控制時，便邁入了以資本主義商業運作的邏輯。這當可解釋一九九〇年代或解嚴後，當圖書出版不再受政治左右時，以市場為導向的傳記圖書類型，如「商業理財界人物」、「演藝界人物」、「體育界人物」等類型的傳記圖書出版數量呈現明顯增加趨勢的現象。

4.3.2 經濟力增強

台灣戰後初期，國民政府亟欲消弭日本殖民統治於台灣社會餘留的影響並鞏固其政權，在一黨獨大、強人政治的情勢下，政治力明顯凌駕於經濟力之上。而當一九六〇、一九七〇年代台灣經濟逐漸起飛，且由農業社會轉型為工商社會後，經濟力則不再完全受政治力所牽制。及至一九八〇年代末期解嚴致使政治力鬆綁，而台灣也全面邁入商業導向的經濟型態，此時經濟力已轉而凌駕於政治力之上，甚至趨使政治體制必須適應經濟制度（辛旗，1991，頁 3-17）。

經濟力增強與傳記圖書發展間之關聯，首先可從傳記圖書的生產過程加以探討。在這個部分，本研究主要是著重在出版者對於傳記圖

書的選擇上。一直以來，傳記圖書所描述的傳主多為主流價值中認為值得為其作傳的人物。戰後初期其功能之一，尚包括扮演一種「宣傳工具」，傳記中常會提出一些結論，期望讀者學習效法(鄭尊仁，2002，頁 222)。而這類可作為宣傳工具的傳記圖書，多為「政治軍事界人物」類型者。書中除了記述傳主的成長與生平外，且間雜著愛國情操、民族主義和反共抗日的思想等。於是，出版社一方面受制於政治力，一方面亦受限於傳記圖書的固有價值，所選擇出版的傳記圖書，未必以市場為考量，也不見得考量到讀者是否會青睞。例如，本研究統計中在傳記圖書出版數量上排名前十大的近代中國出版社，自民國十六年到八十年，出版了一系列為數眾多的 先烈先賢傳記叢刊。這樣的書系規劃，在倡導愛國思想的意味上顯然多於商業利益上的考量。而如臺灣商務印書館、明文書局、廣文書局所出版的一系列翻印自古代傳記的圖書，自有其學術上的價值，但亦非著眼於市場和讀者口味。

約自一九八〇年代起，經濟力明顯增強；而解嚴後或說是一九九〇年代之後，經濟力藉由政治力的鬆綁幾乎全面左右了傳記圖書的出版。出版社在選擇欲出版的傳記圖書時，當然各有其不同的考量，或全然為了銷售利潤，或多少希望傳達文化理想，但不可諱言的，市場是否能接受、讀者會否消費，已成為出版社在選題時的主要考量。因此，一些不符時代潮流、不具商業賣點的人物類型自然受到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具有高知名度的各大選舉候選人、政治菁英、商業名人、演藝界與體育界的明星等。因為這些人具有賣點，出版社在行銷上也才會有著力點。是以，在一九九〇年代後，「商業理財界人物」、「演藝界人物」和「體育界人物」等類型的傳記圖書出版數量方呈現明顯的成長。而經濟力的增強使得重商主義興起，也是促使「商業理財界

人物」類型的傳記圖書在出一九九〇年代後格外受到矚目的原因。

4.3.3 價值多元化

台灣自戰後以降經過五十多年的發展，隨著政治力鬆綁、社會風氣自由開放、資訊氾濫且便於取得，社會大眾的價值觀也從過去的傾向於二元判斷轉趨為多元。價值多元化的趨勢表現在諸多層面上，而與社會脈動間有著密切關係的傳記圖書自然亦受其影響。

本研究乃是以傳記所誌之人物作為傳記圖書分類的標準，且提出十三種不同人物類型的傳記圖書以觀察之。因此當可循此脈絡，由傳記人物類型的趨於多元來觀察價值多元化與傳記圖書發展間的關係。論及人物類型的多元化，最明顯可察的一個面向即是職業，而這也與本研究在分類上的基準吻合。鄭尊仁（2002，頁 255）在討論一九九〇年代傳記文學的出版現象時，亦提出了「人物職業多樣」的趨勢。他認為在商業導向下，只要是名人便可能具有賣點；而若精確地掌握出版時機，任何職業的人物傳記都有成為暢銷書的可能性，不論是職業棒球場上的明星球員、攝影師、影視紅星、黑道大哥皆然。

此外，由人物典範轉移的觀點來說明價值多元化對傳記圖書的影響，也是一個適切的詮釋角度。基本上，傳記所誌之人物，絕大多數是社會大眾認為具有成為人物典範的條件，其成就與功蹟值得讚美稱頌、學習效法者。是以，在整個歷史洪流中已成為社會公認之人物典範者，如具有不朽成就之文學家如莎士比亞、藝術家如梵谷、科學家如愛迪生等，乃被認為是每一個世代都必須認識的典範人物，其傳記也自然地一再被出版。

然而，某些類型的傳記人物，卻是在不同的時代具有不同的社會形象與地位。如本研究前述之分析，可知在一九九〇年代以後或解嚴以降，「商業理財界人物」、「體育界人物」、「演藝界人物」等類型的傳記圖書在出版數量上呈現出明顯的成長趨勢。筆者認為，這是因為台灣在轉型為工商業社會，且政治干預力減弱、社會風氣開放後，一般民眾對於成功者的定義略有改變所致。不再只有高高在上、掌握權力的政治高層人物，或是拋頭顱、灑熱血的先賢先烈值得尊敬；其他領域中的佼佼者亦可一躍而為新的典範人物。例如，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以後，全球經濟幾乎都籠罩在一片衰退不振的陰影下，台灣亦面臨景氣蕭條的窘境。是以，經營成功的企業家、白手起家的創業者，或是馭財有術者、職場上的尖兵，在此社會情境下尤其成為大眾所仰望的典範人物，「商業理財界人物」的傳記圖書方能異軍突起，獲得作者（不論是企業家自行創作，或由他人捉刀）、出版者與讀者的青睞。此外，由於「體育界人物」和「演藝界人物」的社會地位有逐漸提高之勢，且此中領域之成功者亦予人名利雙收之印象，因此也成為新的典範人物。

張海靜（2000，頁 69）提到，「一個愈成熟開放的社會，它的出版品種類就愈多元，愈有更多的可能性。」傳記圖書屬於圖書出版品中的一類，它的類型亦隨著社會日益開放而愈見多元。不只是一般主流價值中所認為值得為其作傳的菁英能出版其傳記，非主流價值中的人物，如同性戀者、罪犯，或是名不見經傳的市井小民，都在價值多元化的趨勢下，得以因為他們的某些特殊性而成為傳記的主角。如此趨勢，使得傳記圖書的內容更為豐富多樣。而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往後或許會有更多過去未曾有傳的人物成為傳記圖書的傳主。

4.3.4 小結

傳記圖書的出版，不可能獨立於社會而存在。本研究為進一步探討傳記圖書發展背後的作用因素，乃根據社會變遷中的三個主要面向：「政治力鬆綁」、「經濟力增強」與「價值多元化」加以闡述之。事實上，這三個面向雖可獨立探討，但之間卻是互相牽制影響的。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傳記圖書之類型及其發展，首先確定研究目的、研究對象與範圍，並經由文獻探討，選定適合的研究方法，蒐集登錄自一九四五到二〇一二年台灣地區營利性出版單位所出版之傳記圖書書目共計六一七部，再以符合本研究立意之傳記圖書分類方法將所登錄之書目分為十三類，得出各類型傳記圖書的出版總數。筆者乃根據整理統計之數據加以分析，以勾勒描述台灣傳記圖書類型的發展，並透過知識社會學的觀點詮釋之。本章茲整理出研究所得之結果，並說明研究限制，提出研究建議。

5.1 研究結果

首先，根據本研究統計整理而得之數據，可對於台灣傳記圖書在出版數量上所呈現的發展狀況有所了解。比較傳記圖書與所有圖書的出版數量，可得出一個具體的結論：戰後迄今，台灣傳記圖書的出版總數約占整體出版圖書量的 1.09%；且傳記圖書並沒有隨著年代而增加其比率。亦即，雖然台灣圖書的出版量確實有逐年增加之趨勢，然而傳記圖書的所占比率始終維持一定的水準。若粗略將戰後以來的五十七年分為一九五〇年代以前、一九六〇年代、一九七〇年代、一九八〇年代、一九九〇年代以後等階段，則一九九〇年代以後，傳記圖書出版數所占的比率甚至是各階段中最少的，僅有 0.80%。由此可知，許多文獻中提到一九九〇年代或解嚴後傳記圖書「大量興起」的現象並不完全正確。會有這種印象的形成，應該是一九九〇年代或解嚴後所出版的傳記圖書，多以各個領域中的知名人物為傳主，如政治明星、商業鉅子、演藝名人等，不但引起注目，且屢創銷售佳績，乃造成了傳記圖書大量興起的錯覺。此外，一九九〇年代以後，在「其

他人物」類型的傳記圖書中，有許多是以在現實條件上處於弱勢的「平凡中的不平凡者」作為傳記主角，而引起讀者的共鳴，遂能成為暢銷書，例如賴東進（2000）的《乞丐囡仔》。因此，雖然整體而言，傳記圖書在書市中的所占比率並未若想像中的高，一九九〇年代之後其具體出版數量也未有增加之勢。但因其易成為話題書，在實際銷售成績上又有優異的表現，使得傳記圖書此一類型格外受到關注。

而在符合研究範圍的六一七部傳記圖書中，計有四六一二部為本土創作，一四九五部為翻譯作品，本土創作所占的比率為 75.52%，明顯高於翻譯作品的 24.48%。進一步檢視本土創作與翻譯作品的傳記圖書於各年代的出版狀況，也可發現，台灣所出版的傳記圖書仍多為本土的創作，歷來皆然。並未像其他書種，如科普圖書、文學小說等，在翻譯圖書的出版比率上逐年增加。

此外，根據本研究之統計，歷年來在傳記圖書的出版數量上較多的前十家出版社依序為：臺灣商務印書館、明文書局、傳記文學出版社、時報出版社、名人出版社、廣文書局、正中書局、近代中國出版社、聯經出版社、天下文化。基本上，臺灣商務印書館、明文書局、廣文書局等，是因其有系統地翻印大量傳記古籍，如臺灣商務印書館的《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明文書局的《明代傳記叢刊》及《清代傳記叢刊》、廣文書局的《年譜叢書》等，所以累積了為數頗多的傳記圖書。然而，這些傳記圖書的出版多集中於一九八〇年代之前。而傳記文學出版社、名人出版社、正中書局、近代中國出版社所出版的傳記圖書，亦多為一九八〇年代之前所出版。至於時報出版社、聯經出版社及天下文化所出版的傳記圖書，即多為一九八〇年代之後所出版。

再者，本研究選擇以傳記所誌之人物作為分類標準，將傳記圖書分為若干類型，以俾有系統地檢視台灣傳記圖書的發展。在比較數種分類方式，並佐以登錄書目過程中對於傳記圖書的概略了解，且嘗試粗略分類而加以調整後，將戰後至二〇一二年台灣的傳記圖書分為十三類：1.「政治軍事界人物」；2.「商業理財界人物」；3.「文學歷史界人物」；4.「思想界人物」；5.「藝術界人物」；6.「科學界人物」；7.「學術教育界人物」；8.「大眾傳播界人物」；9.「演藝界人物」；10.「體育界人物」；11.「特殊女性」；12.「其他人物」；13.「合集」。理論上，這固然不是一個絕對嚴謹而幾近完美的傳記圖書分類，事實上，卻是本研究為了分析台灣傳記圖書，不得不進行的一個嘗試。

透過本研究所建構的十三個傳記圖書類型，將符合研究範圍的六一七部傳記圖書逐一分類後，可清楚得知各類型的發展趨勢。整體而言，歷年來在十三種類型中，出版數量最多的前三類為「政治軍事界人物」、「文學歷史界人物」、「合集」；出版數量最少的前三類則為「大眾傳播界人物」、「體育界人物」及「特殊女性」。

為進一步觀察各類型的歷時性發展，本研究乃以兩個時間上的基準點作為統計的基礎：一是大致以十年作為一個階段；一是以解嚴為分水嶺，劃分為戒嚴時期與解嚴時期。經過數據的整理統計和比較分析後得知，「政治軍事界人物」類型的傳記圖書出版總數於所有類型中所占比率最高，歷年來皆維持在 30% 左右。但是，其數量並未因政治開放而增加，然而其在實質內涵上確實有所改變。尤其是中國大陸政治軍事界人物的傳記圖書，幾乎皆集中於一九九〇年代以後出版。此外，「商業理財界人物」、「演藝界人物」、「體育界人物」及「其他人物」等類型的傳記圖書，亦於一九九〇年代後呈現顯著的成長趨勢。

最後，本研究不只希望呈現出傳記圖書的統計數據，亦希望進一步反思形成台灣傳記圖書此等面貌的因素，因此乃依循社會變遷的脈絡，分別從「政治力鬆綁」、「經濟力增強」與「價值多元化」三個主要的面向闡述之。在政治力鬆綁方面，出版政策法規的轉變以及一九八七年的解嚴，對於傳記圖書的發展，尤其是「政治軍事界人物」一類型著實形成深刻的影響。例如，中國大陸政治軍事界人物的傳記圖書幾乎皆出版於解嚴後，即是一個明顯的例證。在經濟力增強方面，由於經濟力在解嚴後轉而凌駕於政治力之上，使得出版社在選擇出版的傳記圖書時，多著眼於商業利潤的考量。在價值多元化方面，人物職業的漸趨多元，以及人物典範的轉移，使得傳記圖書的內容有更多可能的空間。一些過去不符主流價值、不合正道的某些人物亦能在價值多元的趨勢中得以成為傳記圖書的主人翁。

5.2 研究限制

圖書是保存人類思想與情感最重要的載體之一，針對圖書的演變進行觀察分析，亦可窺知社會的變遷、文化的傳承。然而，在台灣的博碩士論文中，直接以各類型圖書作為研究對象者並不多，而以傳記圖書為研究對象者則更為稀少。本研究以台灣的傳記圖書作為研究對象，亟欲探究傳記圖書各類型在質與量上的變化發展，並以知識社會學的觀點進行分析詮釋，在相關領域中實屬一探索性研究。筆者除了參考數量有限的文獻外，即是以一己之心力探索之，因此在研究上面臨若干限制。

本研究在進行過程中的研究限制，茲臚列如下：

一、研究範圍之限制

本研究之對象為台灣傳記圖書，研究範圍以時間為縱斷面，起迄點乃是一九四五至二〇一二年，涵蓋了台灣戰後以來的五十七年，在時間上尚屬完整，可清楚勾勒台灣傳記圖書歷時性的發展。但在橫斷面上，乃是以營利性出版單位所出版、且依出版法及圖書館法送繳國家圖書館，分類號為 780 至 789 的傳記圖書。然而，台灣地區的傳記圖書除了營利性出版單位所出版者，尚有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史館等單位所出版的傳記圖書。從知識社會學的觀點言之，這些非營利單位所出版的傳記圖書，亦與社會存在著密切關係，乃是在整個社會的條件下所形成的產物。若能一併蒐羅這些出版品檢視之，或是與營利單位出版的傳記圖書做一比較，或能更清楚完整地了解台灣傳記圖書的面貌。

此外，早期的出版社不一定皆會依出版法繳交所出版之圖書，且傳記圖書此一類型在定義上仍有其曖昧模糊之處。因之，本研究以國家圖書館所整理的圖書書目中之傳記圖書作為研究範圍，自然有可能忽略其他一些亦可納入討論之傳記圖書。

所以，雖則本研究所登錄之六一七部傳記圖書，占了戰後以降台灣地區已出版之傳記圖書的絕大比率，但一定有未盡完整之處。此即研究範圍之限制。

二、圖書分類方式之限制

在圖書分類方式的限制上包含兩個層面：

（一）筆者參考諸多傳記圖書的分類標準，在比較其特性及考量本研究之立意後，選擇以傳記所誌之人物作為分類的標準，並將台灣

的傳記圖書分為十三類，以此分析各類型傳記圖書質與量上的變化。如前所述，欲建構一個嚴謹而完美的分類，在圖書分類上是極難實踐的。雖然如此，本研究仍是進行了大膽的嘗試，並以此分類所得之結果闡釋台灣傳記圖書的發展。很顯然的，本研究之分類絕對有其缺失和限制，這是必要之惡，也是本研究無法避免之研究限制。

(二) 本研究在進行傳記圖書分類時，乃是以傳記所誌之人物作為標準，若由書目上明確可知該本傳記之傳主為何人、屬於哪一類型，則直接加以分類；若從書目上無法得知傳記所述之人的職業或主要貢獻，則透過其他文獻的搜尋以獲知傳主之生平背景再做判斷，或是直接瀏覽傳記圖書得知傳主身分。

雖然筆者已盡最大企圖以掌握每本傳記圖書所述傳主之身分背景，然本研究之範圍包含六一七部傳記圖書，且在筆者未一一閱讀的情況下，如此分類方式恐怕還是很難避免「忽略文本內容」的缺失。而欲真正了解傳記圖書的內容、了解所述人物的類型，最好的方式還是直接閱讀文本，方能進行更為完善的分類。但由於本研究範圍之書目數量龐大，筆者難以真正做到這一點，是故，此亦為本研究之限制。

5.3 研究建議

本研究之目的在透過對傳記圖書的分類，以俾完整檢視台灣傳記圖書的發展，並援引知識社會學的觀點加以分析。後續研究者或可以本研究為基礎，進行更深入完整的探討。根據本研究的限制和不足之處，筆者茲提出以下數點建議以茲後續研究者參考：

一、除了營利性出版單位所出版的傳記圖書外，尚可將非營利單

位所出版的傳記圖書一併納入，以便更完整地了解台灣傳記圖書的整體發展。又或可將兩者所呈現的內容做一比較，觀察出其他值得注意的發展狀況。

二、由於本研究探討的對象為台灣之傳記圖書，是故在傳記圖書的分類標準上，多以台灣的文獻為參考依據。然而，雖然中國的傳記圖書、或者台灣的傳記圖書，皆有其不同於西方傳記體裁和內容之處，但是關於傳記圖書的分類，仍可參考國外文獻。甚至，可比較中外在傳記圖書分類觀點上的差異。或者，也可比較中國大陸以及台灣在傳記圖書分類方式上的差異。循此脈絡，亦可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來探討傳記圖書類型於不同時空之下的差異。

參考文獻

一、政府文獻、出版年鑑

何飛鵬 (2002), 二〇〇二年非文學類出版市場分析,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出版年鑑, 249-252 頁。

曹韻怡 (1990), 民國七十七、七十八年非文學類圖書出版概況,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出版年鑑, 65-68 頁。

二、百科全書、字辭典

三民書局大辭典編纂委員會 (1985), 大辭典, 台北: 三民書局。

中華大百科全書編委會 (1993), 中國大百科全書, 台北: 錦繡書局。

台灣中華書局辭海編輯委員會 (1980), 辭海最新修訂本, 台北: 中華書局。

台灣中華書局 (1988), 簡明大英百科全書中文版, 台北: 中華書局。

光復書局大美百科全書編輯部 (1990), 大美百科全書, 台北: 光復書局。

Jary, David & Jary, Julia (1991/1999). *The Harper Collins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周業謙、周光淦 (譯), 社會學辭典, 台北: 貓頭鷹出版社。

三、期刊、報紙

朱文雄 (1978), 當代人物傳記與現代青年, 台灣教育輔導月刊, 28 卷 5 期, 3-4 頁。

杜維運 (1984), 傳記的特質和撰寫方法, 傳記文學, 45 卷 5 期, 39-43 頁。

李景薇 (1994), 出版界年度十大新聞, 出版情報, 69、70 期合刊,

30-33 頁。

吳興文 (1997), 民國 84、85 年圖書出版業概況, 出版界, 50 期, 24-31 頁。

徐淑卿 (2001 年, 1 月 7 日), 影響 2000 年度出版大事回顧, 中國時報, 12 版。

張瀚菁 (1994), 傳記狂飆·書市沸騰, 出版流通, 28 期, 9-10 頁。

胡梓 (1995), 解讀傳記圖書的熱潮, 書香月刊, 52 期, 2-4 頁。

胡衍南 (1993), 歷史?新聞?內幕?隱藏在傳記熱背後的幾個現象, 文訊, 98 期, 25-28 頁。

馬耀民 (1993), 傳記在西方文化中的發展與流變, 文訊, 98 期, 18-20 頁。

謝寶煖 (1994), 傳記資源之利用, 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 新 27 卷 2 期, 61-88 頁。

四、專書

王振鵠 (1990), 圖書館與圖書館學, 載於中國圖書館學會出版委員會主編 (頁 41-70), 圖書館學, 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

余敏主編 (2002), 出版學, 北京: 中國書籍出版社。

何光國 (1994), 文獻計量學導論, 台北: 三民書局。

辛旗 (1991), 台灣社會的三階段變遷論——四十年來的社會結構與文化價值體系, 載於詹火生主編 (頁 3-17), 社會變遷與社會福利, 台北: 財團法人民主文教基金會。

辛廣偉 (2000), 台灣出版史, 河北: 河北教育出版社。

林芳玫 (1994), 解讀瓊瑤愛情王國, 台北: 時報文化。

林穗芳 (1998), 中外編輯出版研究, 武漢: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袁方主編，林萬億審訂(2002)，社會研究方法，台北：五南出版社。

黃瑞祺(1982)，意識形態的探索者——曼海姆，台北：允晨文化。

黃淵泉(1986)，中文圖書分類編目學，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Berger, P.L. & Luckmann, T. (1966/1991)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鄒理民(譯)，知識社會學——社會實體的建構，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Mulkay, Michael (1979/1991) .*Science and Sociology of Knowledge.*

孫中興校訂，蔡振中(譯)，科學與知識社會學，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Bruner, J.S., Goodnow, J.J., & Austin, G.A. (1956) .*A Study of Thinking.*

New York : Wiley.

Oates, Stephen B. edited. (1986) .*Biography as High Adventure——Life Writers Speak on Their Art.* Massachusetts :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五、學位論文

王乾任(2002)，台灣社會學書籍出版史研究：1951-2000年。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周明慧(1998)，國家角色與商品網絡：台灣地區圖書出版業發展經驗，東吳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胡欣怡(2002)，胡適的傳記文學研究，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莊麗莉(1994)，文學出版事業產銷結構變遷之研究——文學商品化現象觀察，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張永政(1996), 讀者閱讀政治人物傳記式書籍之印象研究 以《李登輝的一千天》為例, 文化大學新聞系碩士論文, 未出版, 台北。
- 張海靜(2000), 文化與商業的巨網 商業機制下出版人的抉擇行為研究, 南華大學出版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 嘉義。
- 黃明賞(1999), 從新聞寫作到傳記寫作 記者角色的一個時代性觀察, 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 台北。
- 許文華(2002), 醫學基因工程文獻之書目計量學研究, 政治大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 台北。
- 廖卓成(1986), 梁啟超的傳記學, 台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 台北。
- 廖梅馨(1999), 圖書出版產業類型之探析, 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 台北。
- 鄭尊仁(2002), 近代中國傳記文學研究 以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九九年在台出版之個人傳記為對象,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未出版, 台北。

六、網頁資料

鄧志松(1998), 知識社會學, 2002年3月15日, 取自

http://ceiba.cc.ntu.edu.tw/demo_theo_prac/database/Sociology_of_Knowledge.html

附錄一 台灣出版社規劃的傳記相關書系

(出版社名稱依筆劃排序)

出版社	書系名稱
大地	名人名傳系列
大行	名人傳記；傳記叢書
久大	歷史爭議人物
月旦	月旦人物系列
文津	歷史爭議人物
文國	傳記叢刊
中華日報社	中華日報傳記文學叢書
世界文物	傳記．掌故．趣聞
北辰	世紀人物傳記
希代	名人傳記；名人軼事
近代中國	先烈先賢傳記叢刊
知書房	頂尖人物
帕米爾	風範人物
麥田	大人物系列；運動家；軍事家
星光	實戰風雲
時報文化	People 系列
國際文化	中國名人傳記
業強	中國文化名人傳記；外國文化名人傳記
風雲時代	風雲名人傳記
書林	世界偉人傳記
書華	人物．中國
普全	二戰風雲人物
商周	商業周刊人物
華嚴	中國文學藝術家傳記
絲路	創業風雲錄
新潮社	傳記文學之旅
遠景	大人物叢書
漢風	名人傳記
漢藝色研	偉人的少年時代
漢欣	中國名人軼事叢書
雲龍	人物新傳
偉文圖書	西方偉人傳記
萬象	爭議人物
開今	開今人物系列
貓頭鷹	作家與作品系列
廣文書局	年譜叢書
臺灣商務印書館	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
遠景	遠景傳記文庫

曉園	現代傳奇人物系列
黎明文化	文學名家傳記叢書
龍文	中國現代自傳叢書
驚聲文物供應公司	驚聲傳記叢書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謝實媛(1994, 頁 82-86))



附錄二 戰後至二二二年台灣所出版之中國大陸政治軍事界人物傳記圖書

傳記人物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
毛澤東	1.《毛澤東風流秘史》	浪島	太平洋	1953
	2.《毛澤東與我》	蕭瑜	源成	1976
	3.《改變亞洲歷史的人物：我認識的蔣中正、毛澤東、周恩來、麥帥》	尼克森	洞察	1988
	4.《毛澤東和他的女人們》	京夫子	聯經	1990
	5.《毛澤東黨天下野百合花》	戴晴	新風	1991
	6.《毛澤東思想的中國基因》	汪樹白	日知堂	1991
	7.《毛澤東》	竹內實著；黃英哲、楊宏民譯	自立晚報	1991
	8.《走下神壇的毛澤東》	權延赤	曉園	1991
	9.《三十歲以前的毛澤東》	李銳	時報	1993
	10.《毛澤東大傳：他的傳奇一生》	Ross Terrill 著；文林譯	麥田	1993
	11.《毛澤東與周恩來》	矢吹晉著；魏珠恩譯	倉頡	1993
	12.《毛澤東軼事》	張玉鳳等著	新潮社	1993
	13.《毛澤東評傳》	松本一男著	新潮社	1993
	14.《毛澤東和他的掌權術》	葉永烈	風雲時代	1993
	15.《毛澤東和他的對手們》	克萊爾·霍林沃思	風雲時代	1993
	16.《毛澤東全傳》	辛子陵	書華	1993
	17.《毛澤東批判：名家評毛集》	金鐘主編	克寧	1994
	18.《毛澤東晚年之謎》	劉建祥	漢湘	1994
	19.《毛澤東的功過是非》	李銳	新銳	1994
	20.《毛澤東與周恩來》	矢吹晉著	國際村	1994
	21.《歷史的真實：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證言》	林克、徐濤、吳旭君	書華	1995

	22. 《毛澤東之謎》	明軍、曉峰編	風雲時代	1995
	23. 《周恩來與毛澤東》	京夫子	聯經	1997
	24. 《毛澤東與周恩來》	楊碧川	一橋	1999
	25. 《毛澤東執政春秋》	單少傑	明鏡	2001
	26. 《一陣風雷驚世界：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	韋政通	立緒	2001
	27. 《牽動中國命運之人：毛澤東晚年之謎》	劉建祥	漢湘	2001
	28. 《毛澤東》	史景遷著；林宗憲譯	左岸文化	2001
	29. 《毛澤東與蔣介石》	葉永烈	風雲時代	2002
	30. 《毛澤東自傳》	斯諾著；汪衡譯	台灣古籍	2002
周恩來	1. 《改變亞洲歷史的人物：我認識的蔣中正、毛澤東、周恩來、麥帥》	尼克森	洞察	1988
	2. 《周恩來述評》	方里	水牛	1991
	3. 《永遠的總理：周恩來》	林育德	克寧	1992
	4. 《毛澤東與周恩來》	矢吹晉著；魏珠恩譯	倉頡	1993
	5. 《周恩來的管理藝術》	劉涇山、時學軍、張偉	新新聞	1993
	6. 《周恩來的外交藝術》	季明、劉強	新新聞	1993
	7. 《周恩來之路》	松本一男	新潮社	1993
	8. 《毛澤東舅周恩來》	高伊哥	克寧	1993
	9. 《周恩來批判：名家評周集》	金鐘主編	克寧	1994
	10. 《周恩來的傳奇一生》	李凡	漢湘	1994
	11. 《周恩來傳》	金鐘主編	地球	1994
	12. 《走下聖壇的周恩來》	權延赤	新銳	1994
	13. 《毛澤東與周恩來》	矢吹晉	國際村	1994
	14. 《周恩來與現代中國》	韓素音著；張連康譯	絲路	1995

	15. 《周恩來與毛澤東》	京夫子	聯經	1997
	16. 《毛澤東與周恩來》	楊碧川	一橋	1999
江青	1. 《江青的往時往事往思》	江青	時報	1991
	2. 《末代女皇江青前半生：暴起》	葉永烈	風雲時代	1993
	3. 《末代女皇江青後半生：暴落》	葉永烈	風雲時代	1993
	4. 《國共第一夫人：宋美齡與江青》	劉佳	商周	1995
	5. 《江青浮沉錄》	林青山	大村	1995
	6. 《末代女皇：江青》	葉永烈	風雲時代	2002
鄧小平	1. 《流放中的鄧小平：鄧小平江西蒙難記》	黃文華等口述，關山撰文	晨曦	1992
	2. 《鄧小平》	巴拉奇·代內什著；關思靜、李葉譯	日知堂	1992
	3. 《鄧小平政海走一回》	羅石賢	風雲時代	1995
	4. 《中國最後強人：鄧小平的跨世紀革命》	David S.G. Goodman 著；田西如、李學謙、姜麗容譯	財訊	1997
趙紫陽	1. 《趙紫陽小傳》	舒揚	洞察	1988
	2. 《趙紫陽》	沈大為等著	日知堂	1992
陳永貴	1. 《中國頭號農民：陳永貴浮沉錄》	吳思	新銳	1994
葉群	1. 《葉群之謎：一個秘書眼中的葉群與林彪》	焦燁	新銳	1994
林彪	1. 《葉群之謎：一個秘書眼中的葉群與林彪》	焦燁	新銳	1994
	2. 《誰殺了林彪》	王兆軍	世界	1994
	3. 《林彪傳》	林青山	大村	1995
	4. 《林彪王朝興衰實錄》	王振華	韜略	1995
江澤民	1. 《江澤民剖析》	李國強等著	洞察	1989
	2. 《江澤民和他的時代》	何若涵	月旦	1995
	3. 《江澤民傳》	楊中美	時報	1995
喬石	1. 《中共巨頭喬石》	高新	世界	1995

胡耀邦	1.《胡耀邦》	楊中美	日知堂	1992
朱鎔基	1.《朱鎔基傳：從反黨右派到鄧小平繼承人》	高新、何頻	新新聞	1992
	2.《朱鎔基傳奇：中共經濟沙皇評傳》	鄭義	書華	1993
	3.《朱鎔基傳》	楊中美	時報	1997
胡錦濤	1.《胡錦濤：中共跨世紀接班人》	楊中美	時報	1999
	2.《胡錦濤：中國第四代領導人》	白德華、連雋偉	商訊	2002
錢其琛	1.《錢其琛：中共外交教父》	楊中美	時報	1999
汪道涵	1.《汪道涵傳：波濤兩岸第一人》	何若涵	月旦	1999
合集	1.《中共最高領導層》	李谷城	淑馨	1992
	2.《高幹檔案：中共權貴關係事典》	高新、何頻	新新聞	1993
	3.《中共神秘掌權者》	葉永烈	風雲時代	1993
	4.《廬山會議實錄》	李銳	新銳	1994
	5.《中國掌權者．1994年版．大陸卷》	何頻	雲皓	1994
	6.《中共第三代精英份子》	鄭義	獨家	1995
	7.《中共特務頭子》	鄭義	南書房	1995
	8.《誰來執政？上海幫、山東幫、北京幫》	鄭義編著	閃亮文化	1997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個人簡歷

姓名：李靜宜

性別：女

學歷：中興大學中文系（一九九六年畢業）

南華大學出版學研究所（二 三年畢業）

出版領域相關著作：理念清晰．小而美 抗拒潮流的出版異類 ，
出版學刊，5期，14-18頁。

電子郵件信箱：ginglee@mail2000.com.tw